阿尔及利亚史

〔法〕加布里埃尔·埃斯凯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阿尔及利亚史

（1830—1957年）

〔法〕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著

上海师范大学《阿尔及利亚史》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Gabriel Esquer

HISTOIRE DE L'ALGÉRIE

(1830—1957)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7

根据法国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译出

内 部 读 物

阿 尔 及 利 亚 史

（1830—1957年）

（法）加布里埃尔·埃斯凯著

上海师范大学《阿尔及利亚史》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625　插页3　字数76,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统一书号：11171·85　　定价：0.61元

出版说明

《阿尔及利亚史》是一本简要地叙述自 1830 年法国入侵起到 1957 年为止的阿尔及利亚历史的小册子，它着重介绍阿尔及利亚现代史。本书于 1950 年第一次出版，我们根据 1957 年第二版增订本译出。

作者加布里埃尔·埃斯凯曾经长期担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府图书档案保管员、国立阿尔及尔图书馆名誉馆长。他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阿尔及尔的占领》等。他在本书中对阿尔及利亚历史的评述，完全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沿袭了陈腐的资产阶级观点，诡称法国最初占领阿尔及尔"是结束了一场混乱的债权清算"，胡说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的解放战争"是由于显贵的虚荣心受到打击而引起的"，并宣扬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繁荣昌盛。值得注意的是，在 1957 年增订本中，作者更是恶意攻击 1954 年阿尔及利亚反

对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是“盗匪行径”；而在篇末，作者甚至预言阿尔及利亚终久要向帝国主义乞讨才能活下去。

革命导师早就对这种美化殖民制度的反动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恩格斯在1857年指出：**“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一直是不断屠杀、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每个新总督上任无非是为了重复他的前任的一切暴行”。**[①]一部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正是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侵略和剥削的血腥罪行的记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以后，一个多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先后爆发武装起义达五十余次。一部阿尔及利亚近现代史，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反侵略、反压迫、反剥削的英勇斗争的记录。本书虽然对此竭力加以诋毁，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过。阿尔及利亚人民经

①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04、107页。

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赶走了法帝国主义，于1962年独立。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关于“**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①]的论断的无比正确。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生活得更好，事实宣告了作者预言的破产。

目前，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著作虽然不少，但重点大都不是叙述阿尔及利亚现代史。本书在这方面可供参考。

① 引自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目　录

第 一 章

远征阿尔及尔

占领阿尔及尔，既不是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或一次旨在解放俘虏的十字军远征，也不是补偿了法国在摄政区的权益所遭受的某些严重损失，而是结束了一场混乱的债权清算。

两个阿尔及尔的犹太商人巴克里和比斯纳赫，曾承担为督政府供应一批小麦。他们履行义务的方式，使这件事成了可疑的交易，从而把结算拖延了下来。这两个商人用贿赂取得了达来朗[1]的庇护，后者就让人们作出决定，既然阿尔及尔德伊[2]侯赛因本身是巴克里-比斯纳赫的债权人，那

[1] 沙尔·莫里斯·达来朗-贝里戈尔 (Charles Maurice Talleyrand-Périgord 1754-1838)，公爵，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以政治上极端无原则和贪婪著称。——译者

[2] 德伊，1671-1830年期间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封建统治者的称号。——译者

就与这笔债权有直接关系；从这时起，这笔可疑的债权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国家事务。在犹太人领到了好几次分期付款以后，他们的最后账单已从一千八百万减为七百万，对于被认为债权的这七百万，他们有特权收取，因为他们是代表巴克里的亲属或朋友的。德伊对这一亲属的结算是不了解的，而1820年7月24日的条例也没有把他作为收款人，于是他的债权在法律上就被完全剥夺了。

对于侯赛因的要求，国王政府没有作出其他答复，只是就阿尔及利亚的赖斯[1]侮辱教堂的华盖一事要求赔偿，而侯赛因却把得不到答复的原因归咎于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他的不明朗的态度激怒了侯赛因。1827年4月29日，正值巴伊兰节[2]之际，德瓦尔前往庆贺，侯赛因再次询问德瓦尔，为什么法国政府一直不予答复。领事申辩道："我国政府将不给您信件，这就是说您的请求无效。"这个用平常的或者粗暴的语气所作的回答，使德伊大发雷霆。他命令德瓦尔离开，德瓦尔

① 赖斯（reïs），土耳其帝国官员和大臣的称号。——译者

② 巴伊兰节 （Baïram），两个穆斯林节日的名称：一个在伊斯兰历最后一个月（朝圣月）的第十日，称为大巴伊兰；另一个在斋月结束时，称为小巴伊兰。——译者

却丝纹不动，于是德伊用自己的扇子打了他。

查理十世政府当时正穷于应付国内政治上的困境；而希腊事件[①]所引起的纠纷，使法国舰队羁留远方，无法行动。在二十二个月中，政府对于阿尔及尔，只坚持封锁和进行同样毫无成果的谈判，坚决要求侯赛因谢罪，而侯赛因却认为不应该由他来道歉。1829年8月3日，打着使者旗子的“普罗旺斯”号二等艇无缘无故地遭到阿尔及尔炮台的轰击。政府还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与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利进行谈判，阿利以征服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摄政区为己任。他的这个荒诞计划，颇得内阁首相波林尼雅克[②]的赏识，他想入非非地把它看作为实现“从地中海非洲沿岸直至亚洲内部建立法国的势力范围”这样一个宏伟计划的步骤。

政府为了结束上述事情，也希望取得胜利来提高威望，决定于1830年2月发动远征。经过三个月的准备，5月25日，海军上将迪佩雷的舰队离开土伦，舰上载有布尔蒙将军带领的一支三万

① 指1821-1829年希腊独立运动。——译者

② 一译波里雅克。——译者

人的部队。由于遇到恶劣气候，舰队在帕尔马稍作停留以后，于6月14日在西迪费鲁希港湾登陆。19日，在斯塔乌埃利击溃了土耳其-阿拉伯部队。29日，法军到达一处，从这里可以望见皇家城堡——它于7月4日被摧毁。晚上，布尔蒙向侯赛因发出一份协定文本，要德伊照此签字。阿尔及尔城便无条件投降了。布尔蒙对所有居民的人身自由、宗教活动和财产所有权给予保证。翌日，法军占领了阿尔及尔。

这样，法国就在整个摄政区取代了土耳其的权力，对于胜利者来说，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而对这片土地的无知则导致他们犯下了严重错误。人们不是利用现存的事物，而是仓促应付。他们径自进行活动，仿佛土耳其人没有建立过政府似的；而土耳其人尽管人数不多，还是能够管理这片地区，并足以处理政权和居民——包括阿拉伯人和伊斯兰化的柏柏尔人——之间关系的。犹太市民和摩尔市民，由于考虑到顺从的好处，向胜利者献殷勤，在这些市民之中，我们发现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们同那些被视为“粗野者”的阿拉伯人截然不同。人们把这些“优秀分子”看作为不可缺少的人，并

利用他们组成阿尔及尔市政府，其成员连最下层的人也有份。人们不是任用一个军人，而是找一名出身和职业都被人瞧不起的、不象阿拉伯阿加[1]那样受人尊敬的摩尔商人。对于那些只要求归由法国国王雇用的土耳其民军，由于摩尔人的告发，都被送往小亚细亚。炎热的气候，使得部队的卫生条件变得"极坏"。8月11日传来了七月革命的消息，那些曾占领过瓦赫兰和波尼[2]的部队被召回到阿尔及尔，并以三色旗来替换白色旗[3]。

7月7日那天，布尔蒙宣称："摄政府大致在十五天以前已经降服"，这是将被事实所否定的乐观主义看法。征服阿尔及利亚该是一项长期的、代价高昂的工作。一个胜利者总得迫使战败者接受他的统治，对已征服的土地行使征服者的权利。这双重的事实占居主要地位，并说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历史。

① 阿加(agha)，意为指挥官和部族的长官。——译者

② 波尼，现改名安纳巴(Annaba)。——译者

③ 三色旗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白色旗是复辟王朝的国旗。——译者

第 二 章

七月王朝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

一、有限占领和自由殖民（1830—1840 年）

查理十世把一个未作任何立约的容易放弃掉的征服地留给他的继承者。将近 7 月中旬的时候，查理十世曾决定法国将保有阿尔及尔。国内体制的更换，并没有改变已经采取的决定。热拉尔内阁于11月30日明确表明了“建立一个重要殖民地”的意图。法国对比利时事件的不关心态度，使英国从法国对阿尔及尔的占领中看到一种补偿——它有利于转变法国对来因河左岸的野心。安特卫普[①]将是阿尔及尔的赎金。由于英法两国政府都必须考虑各自国内的舆论，双方都意识到最好还是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① 安特卫普，比利时港口名。——译者

由此可以说明，在巴黎，议会为什么责令政府宣布法国是否留在阿尔及尔，可是大臣们从未作过明确的回答，反正关于这个地区，它的居民，它的资源和法国能从中获得那些利益，没有人掌握可靠的资料。实行一项确定的政策是谈不上的。但是那些对这片土地一无所知而又希望确定其前途的军官、官员、移民、记者和普通人，却并非没有编写出一部专著、一些小册子来。在这些作品中，主张放弃和主张保有阿尔及尔，都自称是为法国的利益着想的。政府再也不能利用摩尔人了，因为他们在阿尔及尔策划了恢复穆斯林政府的拙劣阴谋，致使他们流亡巴黎，而当时巴黎人却把这些香料商人当作是阿拉伯的显贵。

然而对于反对派来说，这个问题倒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有一些本来就反对殖民活动的人，从法国以前曾放弃印度、加拿大和圣多明各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法国缺乏殖民者的才能，而对法国来说，夺取新领地是疯狂的举动。幻想阿尔及尔完全象老殖民地那样，能够生产咖啡、棉花、靛青、甘蔗，这不仅使那些在西印度群岛有利益的人，而且也使种植甜菜的各省议员们感到不安，他

们已经看到阿尔及利亚的食糖充斥法国市场。人们所熟知的非法征课、就地正法和毫无成果的军事行动，终于使那些身居议会要职的“大人先生们”为之头痛，这些先生们，满脑子装的是经济上合算和正规管理的想法，他们对军人本来就不信任。

因此，对政府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有待于从非洲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中取得一项经验，从而再从这种经验主义中得出一条原则。政府指令派往非洲的将军们向它报告情况，而不让他们谈论。但是在阿尔及尔相继任职的指挥官们，却总是按照他们先入之见和各人的禀性来揭示这个地区。

至于布尔蒙的继承者克洛塞尔（1830年9月至1831年2月），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得出了与他天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相一致的关于阿尔及尔前途问题的看法。他的远征麦迪亚只是简单地来回兜了一圈，以此作为拿破仑式捷报的根据。有了他，一切都显得轻而易举，巴黎满意地获悉，占领这个地区只需少量的费用和人员，况且这个地区还将成为法国的财源。但是，正当克洛塞尔同突尼斯贝伊达成协议，决定将瓦赫兰省和君士坦

丁省由臣属法国并向它纳贡的突尼斯亲王来治理时，这一从财政上来看大有好处的而又不花多大代价就能扩大我们主权的计划，却被外交大臣取消掉了，这位大臣因一位头脑简单的将军擅自同一位外国君主进行磋商而感到不快。

克洛塞尔让位给贝特泽讷（1831年2月至1831年12月），他也要指挥远征麦迪亚。他没有在失败中改变策略，弄到不得不在阿尔及尔筑垒孤守。他在一些报告中反复提到，这个地区没有前途。这种悲观主义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卡齐米尔-佩里埃内阁采取一些措施，表明不能放弃。1831年6月5日，巴黎成立了阿尔及尔事务管理局；一个民政总监被派往非洲，领导那里的行政。陆军大臣苏尔特在四年之中一直关心新殖民地，把占领军人员增加三倍。因已占领波尼，人们在东部省份得以站稳脚根，波尼的卡斯巴[①]，在于代使团屠杀案以后，即由优素福、达尔芒迪和“贝亚恩人”号的水兵占领，成为以后攻打君士坦丁的基地。

总司令罗维戈（1831年12月至1833年4月）

① 卡斯巴（Casbah），中世纪柏柏尔地区统治者的宫殿和城堡。——译者

和民政总监皮松连续不断地发生冲突，双方都不曾预见到彼此必须互让。罗维戈带有他作为警务大臣的老习惯。一个错误念头驱使他去铲除乌菲阿斯部落，这就引起了他们的复仇行动，杀害了一支法国分遣队。他执行那个战时会议的纪律，把两名只持有一张通行证而闯入阿尔及尔的阿拉伯酋长判处死刑。由于这样，他就成了这一地区——他认为这里潜力"无穷"——的狂热者。与之相反，皮松是一个严格而刻板的官员，他憎恶一切专制独裁，坚决保卫国库，反对设置罗维戈要用以安插其亲信的一些职位。同时，由于他曾参加过我们领地圣多明各的结束工作，因此对于阿尔及尔的前途抱着悲观的情绪。皮松和罗维戈之间的冲突，到卡齐米尔-佩里埃死时才终止。苏尔特出任内阁首相后，重新领导起非洲事务。新任民政总监让蒂·德比西改归总司令管辖。

阿尔及尔的消息使得政府处境尴尬，因为它拿不出占领的半点成绩给议会看。为了赢得时间，为了使那些不关心这个问题或者甚至反对的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为了对非洲的局势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苏尔特命令组织以就地调查为任务的阿

尔及尔委员会（1833 年 7 月 6 日）。在此期间，继任罗维戈职务的瓦罗尔（1833 年 4 月至 1834 年 7 月），他作为代总司令所提出的倡议都曾遭到拒绝。占领布日伊[1]——君士坦丁沿海的第二个基地，是巴黎指挥的。瓦罗尔的正直政策，消除了阿拉伯人的疑虑，这种疑虑以往是由罗维戈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引起的。瓦罗尔支持那些表示出有良好意向的酋长，让他们协助维持米提贾的社会治安，建筑公路，排干积水。他的政策，由于阿拉伯局[2]——罗维戈离职后建立——的活动得以顺利执行。诸如拉摩里西尔、佩利西埃·德雷诺等这些熟悉阿拉伯情况的军官，同一些部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经过了三个月的调查，阿尔及尔委员会同由德卡兹主持的非洲委员会合并了。委员会写了一个提供资料的总结报告，它没有放松对占领四年来的责难。委员会的成员们几乎全体一致表示反对放弃阿尔及尔。正是通过这些工作才产生 1834

① 布日伊，现改名贝贾亚（Bejaia）。——译者

② 阿拉伯局，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处理与当地居民直接有关的问题的军事行政机关的名称。在每个被占领的阿尔及利亚的区都设有这种局，它们拥有极大的权力。——译者

年7月22日的法令，把军事指挥权和最高行政管理权交托给一名总督，并由若干民政和军事部门长官组成的一个行政委员会予以协助。这不再是阿尔及尔的问题，也不再是前摄政区的问题，而是“北非法国属地”的问题了，这就排除了任何有限占领的思想。在设置总督还是设置民政总监这个问题上经过一番犹豫以后，决定任命德鲁埃·德尔龙老将军为总督（1834年7月至1835年7月），总督的七十高龄好象是反对冒险行动的一个保证。

两年以来，年轻的哈吉[①] 阿卜德·卡德尔已在瓦赫兰尼亚崭露头角了。尊敬的马拉布特[②] 马迪丁的儿子阿卜德·卡德尔，1808年生于马斯卡腊附近。他受过严格的宗教和文艺方面的教育，同时又在战争艺术中锻炼成长。他两次到麦加朝圣，到巴格达拜谒西迪阿卜德·卡德尔·吉拉尼墓地，正是在那里，他似乎已经事先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悟得一些预言和梦想，使他在穆斯林中享有威望，

① 哈吉（hadj），曾巡礼朝拜圣地的伊斯兰教徒。——译者

② 马拉布特（marabout），是伊斯兰教派的代表，修道士；他们曾积极参加北非各国人民反对欧洲侵略者的解放斗争。——译者

从而在1832年11月5日，当他二十四岁时，被一些部落拥戴为素丹，这些部落曾由马迪丁号召参加过反对法国人占领瓦赫兰的圣战。这位年轻领袖，由于仪态庄严、漠视财富和具有雄辩才能，其威望势必与日俱增。他体魄强壮，思想健全；身临战场，勇敢沉着，而面对谈判则诡计多端。特别是，对穆斯林来说，他具有最崇高的德行，即信仰的强烈和真诚。按照他的说法，他用教规来进行治理，是深通古兰经的人。他一生的唯一目的是，把异教徒从伊斯兰土地上赶走，这种想法就可能同某种个人野心的打算吻合起来了。不了解这些情况，就表明在对待阿卜德·卡德尔的态度上犯了错误。

阿卜德·卡德尔的政府受到土耳其人政府的启发。他在一些重要的中心任命一些哈里发，把部落分成阿加辖区和卡伊德辖区。他实行就地正法、罚款，责成一些部落以集体负责的方式自行承担所在地区的治安。但是他周围的亲信对他帮助不大，他承认，他无法物色一名能代表他的穆斯林。作为埃米尔，他无法亲自插手每一个地方，他许下的消灭无政府状态的诺言——这曾是他得孚众望

的原因之一——随后遭到挫败。他曾想效法法国人，设置一些正规部队、兵工厂和仓库——所有这些对他的敌人来说都将成为战利品。他的真正威力，在于他行动迅速，能经常地、有时又是十分准确地避开我们的纵队；还在于他的个性顽强，从不灰心丧气，即使处于最坏的逆境，仍能继续还击。他总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如果说法国人不了解阿卜德·卡德尔的性格，那么阿卜德·卡德尔也错看了法国人。阿卜德·卡德尔一向确信，作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比起或多或少缺乏信仰的基督教徒来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他把法国人同他谈判的意愿完全看成是懦弱的表现。他认为，从此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打算派一名大使到巴黎去，同法国政府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这就表明，他狂妄自大到了何等地步。

尽管他有威望，但是仍不能把那些丧失民族感情的居民联合起来(从征服一开始，我们就在阿拉伯酋长中发现过一些忠实的助手，他们中间很多人为法国而牺牲)。诉诸圣战和唤起宗教感情，乃是唯一能够联合穆斯林来反对异教徒的方法，

但也没有取得更好成就。虽然他曾亲自干预卡比利亚，却同柏柏尔人的地方主义发生冲突:“你作为朝圣者来到这里，我们以迪法[①]招待你。如果你以马赫曾[②]身份来到这里，那么黑库斯库[③]可能会使你一饱。”他不仅不可能制服库鲁格鲁人[④]世代相传的敌对行动，而且他的政府也甚至被阿拉伯人所疵议。有一些人谴责他:为了争取一项神圣事业的胜利，对政策的信赖胜过上天的救助。另一些人则以某种轻视的眼光看待他，认为与其说他是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拉布特。

1834年，法国政府反对在非洲推行凡是会使开支增加和招致冒险行动的政策。裁减人员势在必行，战争必须停止。确保和平的唯一办法似乎是寄希望于一位当地的首领，这位首领要完成这项任务，得有必要的权力，法国就应使其取得。但是，阿卜德·卡德尔从被公认为素丹时起所发动的圣

① 迪法（diffa），北非穆斯林招待贵宾的一顿饭。——译者

② 马赫曾（maghzen），指摩洛哥在法国“保护”时期的地方行政当局。——译者

③ 库斯库（couscous），阿拉伯人的一种食品，一般用谷物粉，和以羊肉、蔬菜、辣酱油等制成。——译者

④ 库鲁格鲁人(Couloughlis)，是土耳其男人与阿尔及利亚妇女通婚所生的后代。——译者

战，成绩是不大的。他既无力夺取瓦赫兰、阿尔泽、莫斯塔加内姆，也无力占领特累姆森，同时又不能取得那些盘据在迈舒阿尔[①]城堡里的库鲁格鲁人的承认。一些部落对他拒不服从。

就在这个时刻，人们却作出了信任阿卜德·卡德尔的决定，幻想着：既然他会感谢法国对他的提拔，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忠实的属臣，驻扎在给他确定的范围内。在瓦赫兰指挥作战的德米歇尔，看到战争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结局，便通知阿卜德·卡德尔，准备同他进行会面，以结束敌对状态。从埃米尔这一方来说，也希望停战。他一边派人散布法国人要求和平的消息，一边接受了谈判。

政府的训令在协定签订以后才到达。训令预料，阿卜德·卡德尔会正式承认法国的主权。作为交换的东西是，阿卜德·卡德尔将被承认为几个部落的贝伊，向国王纳贡，接受国王的任命。1834年2月26日的条约却截然不同，这个条约一经签字，人们就发觉，阿拉伯文和法文这两种文本是不相同的。在阿拉伯文本中，人们看到，不是承认主权和向国王纳贡，而是这样一种行文：法国将军和

① 迈舒阿尔（Méchouar），特累姆森城的城堡名。——译者

被称为埃米尔——这是不属于任何人管辖的称号——的阿卜德·卡德尔将使两国人民共享团结与和平，这两国人民命运注定要在同一统治下生活，即对法国人来说，只能是法国的统治；对阿拉伯人来说，只能是埃米尔的统治。至于贸易方面的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阿卜德·卡德尔把它看作自己的专利权。

对于我们属臣的权限，没有确定地区的范围。这一容易发生僭权行为的事实，使得这项协定的实施成为双方实力的较量。尽管瓦罗尔提出了意见，但政府还是承认了既成事实。难道德米歇尔没有宣布过整个瓦赫兰省已经归顺我们了吗？他不是作过这样的保证：如果埃米尔转而反对我们，“他的政权就会遭到那些相当明智而没有同他联成一气的居民反抗而垮台”吗？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阿卜德·卡德尔不过是在法国所批准的文件中被承认为埃米尔穆迈宁（信士们的长官）的马斯卡腊的贝伊罢了。

埃米尔仍然拒不归顺，但是他却首先遭到了土耳其人穆斯塔法·本·伊斯梅尔的打击。德米歇尔不愿采纳穆斯塔发的联盟之计，而且还向埃

米尔输送武器。埃米尔曾巧妙地使德米歇尔相信，瓦罗尔妒忌他缔结和约所获得的荣誉，德米歇尔竟向埃米尔保证，将使他成为“从来不敢希望的更加伟大的人物”。

年迈的德尔龙显得无能为力。他意志薄弱，同意了德米歇尔向他提出的看法，听任阿卜德·卡德尔的代理人杜兰的操纵。反正，总督没有权力，政府也不打算进行武装干涉。当麦迪亚的居民埋怨法国人不支持他们，反而抛弃他们的时候，德尔龙只能鼓励鼓励罢了。因此，那些厌恶成为无政府状态——它在这一地区泛滥成灾——的牺牲品的部落，纷纷欢迎定居在米利亚纳和麦迪亚的阿卜德·卡德尔，这表明他那一边是真正强大的。在德米歇尔的懦弱遭到训斥而由特雷泽尔接替他以后，德尔龙还是不同意特雷泽尔力图对付埃米尔的建议。受到鼓舞的阿卜德·卡德尔就投入战争，使特雷泽尔在马克塔遭受一次严重的挫败（1835年6月12日）。

为了稳定局势，布洛利内阁再派克洛塞尔来到非洲（1835年7月至1837年2月）。元帅重返阿尔及尔，意图实现全面征服前摄政区，他深信能

在这里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地，提供最廉价的热带产品。这些计划同已成为政府主张的有限占领政策是有矛盾的。正如1835年5月25日基佐曾说过的那样，问题不是放弃阿尔及尔，而是要完全做到"如愿以偿"的征服，在殖民化方面得排除国家的一切干预。人们应限于"可靠而平静地"占领沿海一带和为保证沿海一带安全所必需的内地，同时应该同居民保持和平关系，这样，贸易关系才会"不费力地"蓬勃发展起来。随后，如果殖民化"本身打下基础"，"便将考虑该怎样确定"行政管理制度。至于阿拉伯人的反应，基佐却毫不在意。尽管他表示有朝一日政府可能愿意保护殖民化，但看来他是不打算扩大殖民地，因为要保护殖民化就要我们占领整个地区。

克洛塞尔经常使内阁面对既成事实。远征马斯卡腊——埃米尔两次吃败仗的地方——只是一无所获地空跑一趟，城市被撤走一空，才勉强被占领下来。战役结束以后，克洛塞尔不顾大臣的责难，还去解除穆斯塔法·本·伊斯梅尔的封锁，后者那时正据守着特累姆森的迈舒阿尔城堡。占领这个城市突出的一点是向友好的居民进行强迫征

税。留守的军队立即陷入包围，建立在塔弗纳河[①]口的营地的处境也是一样。

克洛塞尔着手准备占领东部贝伊分区的首府君士坦丁。1836年1月，他以一道命令废黜了贝伊艾哈迈德，派优素福接替；对优素福来说，在波尼地区拥有虽然过分夸大但是经得起考验的影响。克洛塞尔为了予内阁以良好的印象，使用极大的乐观主义语调来阐明总的形势。事实上，克洛塞尔所任命的一些阿尔及尔省贝伊都已丧失了他们的指挥权；而阿卜德·卡德尔却相反，4月25日，他把达尔郎热将军打得惨败。被派往非洲的毕若在锡卡赫[②]赢得了胜利，这是占领阿尔及尔以来所取得的最显著的胜利，但它并无前途。

1836年2月22日执政的梯也尔，被克洛塞尔的计划和在非洲赢得光荣业绩的前景所鼓舞。6月9日，他在议会里，谴责至今为止所执行的政策是荒谬的。只有全面占领，才能带来和平，迫使阿拉伯人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并建立一个美好的

① 一译塔夫那河。——译者

② 原书误为 Sikkak（锡卡克），应为 Sikkakh（锡卡赫）。——译者

殖民地。议会在 1835 年曾批准基佐的有限占领，而在 1836 年却批准了梯也尔的全面征服。通过梯也尔和陆军大臣同克洛塞尔之间的对话，克洛塞尔得出结论：政府已经决定建立“一种绝对性的治理制度”，而内阁却还蒙在鼓里。9 月 6 日梯也尔垮台，基佐再次在摩莱内阁中任职。

新内阁决定召回克洛塞尔，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巧妙地回避曾经批准或者制止远征君士坦丁的责任。大臣说“只是授权而已”，克洛塞尔却回答，是“命令”。克洛塞尔要求三万作战人员，而大臣假装理解为三万的总数包括非作战人员在内。还说：“这正是您在非洲所拥有的人数。”弄得疲惫不堪的克洛塞尔正在期待机会请求召回，人们便派当雷蒙将军去取代其职。大臣写信给克洛塞尔说，正是“战争的某些偶然事件，国王政府才决定解除你的职务”。这种关怀，预告了克洛塞尔的死亡，这就激怒了他，以不足的兵力向君士坦丁进军（1836 年 11 月 13 日）。士兵们成了大臣和总督不睦的牺牲品。如此轻举妄动以至人们称之为“草率和疏忽”的远征，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军队顶风冒雪，备受折磨，许多人自杀。克洛塞尔开始时原

想把这次远征“由一项异常事件变成一次真正的强大的侦察行动”。而他的去职却使他感到突然。

政府宣称要对这次失败报仇雪耻，尤其是决心确保和平：在西部，得依靠阿卜德·卡德尔来取得和平，可是我们同他刚刚打过仗；在东部，则要同我们的昨天的胜利者艾哈迈德贝伊本人打交道。被任命为总督的当雷蒙(1837年2月12日)，在准备一次新的远征的同时，奉有同贝伊进行谈判的使命。基本想法是，为了谋取法国和平的最大利益，将使两个属臣的势力各守中立。

毕若被派到瓦赫兰，以便同阿卜德·卡德尔进行谈判。在阿卜德·卡德尔方面来说，也很想争取和平。他的政府，仅具雏型，给养也不充足。埃米尔一方由杜兰率领的代表团参加谈判，他施展阴谋，在当雷蒙和毕若之间挑起纠纷——因为他们两人的权限还没有明确规定。毕若对伊斯兰方面的人员和事物毫无所知。加之，“政府想要避免战争；除从速缔结和约外，别无他法”。毕若在主权和纳贡问题上作了让步，纳贡用一次付清的实物税来代替。他放弃了特累姆森和阿尔及尔省通往东部地区的门户——提特里。他写道：“向埃米尔

作更多的让步有利无弊，因为他能提供保证。”谈判中还牵涉到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按照协议，阿卜德·卡德尔应向毕若辖区所筑的村落道路缴付补助金。

这个塔弗纳条约（1837年5月），在1954年发现的阿拉伯文本中，载有为法文文本所没有的而有利于埃米尔的一些明确条款，这些主要条款，载明了边界的划定。

法国把瓦赫兰省让给埃米尔，但瓦赫兰城、阿尔泽、莫斯塔加内姆和马扎格兰除外。在阿尔及尔省，法国保留萨赫勒、卜利达和米提贾，连同该省省会。如果说南部和西部的边界线是划得相当明确的话，那么在东部恰恰相反，它规定我们的权力一直延伸到大约离阿尔及尔三十公里及“以外”的克德达拉河（布杜阿乌）为止。对于毕若来说，“以外”这两个字表示法国保留河以外的领土。相反，阿卜德·卡德尔却认为，既然法国已明确规定以克德达拉河为界，那么“以外”就毫无意义了，因而法国对东部领土无任何权利。对这两个字的不同解释，导致了1839年和平的破裂。我们从条约中所得到的主要利益是，使我们从瓦赫兰地区摆脱

出来，取得了在东部地区的行动完全自由。

内阁承认，对埃米尔所作的让步，大大超过了它所规定的限度，因而在议会里回避讨论。6 月 16 日，摩莱在议会讲台上表示：既然谈判尚未结束，他不能作出任何解释。但在同一天，大臣通知当雷蒙，条约已得到国王批准。毕若承担了他所干的任务的责任。他从宗教出发向埃米尔提出保证——他认为宗教是取得他们信任的最好因素，然而恰恰就是宗教，妨碍了阿卜德·卡德尔忠诚地归顺基督教徒，并赋予他同基督教徒作战的义务。

政府确曾打算利用艾哈迈德贝伊的势力去对抗阿卜德·卡德尔的势力。因此，问题不再是摧毁艾哈迈德贝伊，也不是对君士坦丁进行报仇雪耻了。但当积极准备远征的时候，艾哈迈德和当雷蒙之间的徒劳的谈判却在拖延时间，当雷蒙便用最后通牒结束了谈判（8月 19 日）。奈穆尔[①] 公爵参加的这次远征，也象上次一样，经过猛烈的冲击才占领了君士坦丁（10 月 13 日）。当雷蒙在占领君士坦丁前夕阵亡。已经取得指挥权的瓦莱

① 一译内穆尔。——译者

晋升为法国元帅并被任命为总督（1837年10月至1840年12月）。

头脑清晰的瓦莱，能迅速洞察事情的要害，他的决定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意一旦拿定，非坚持执行不可，而对那些与他的预见相矛盾的事实则置之不顾。他漠视那些对士兵来说较有军事学造诣的人，他从未访问过一个医院。他让各部门长官了解，他们不应有别的愿望，要以他的愿望为准。由于他如此抹煞别人的创造性，以致不久就陷入繁重的日常事务堆里不能自拔。

攻占君士坦丁，使我们的属地扩大了。直接占领贝伊分区，要求更多的人员和增加费用。因此，政府无意保留它的征服地，但又不敢宣布放弃，从而弄得进退两难。八个月过去了，政府还未作出决定。1838年6月6日，民政总监布勒松的演说，使摩莱得以稳定议会的情绪。就布勒松的意见来说，这仅仅是一种解决方法。由于艾哈迈德的垮台，迫使我们在取代他时势必要承担许多新的职责和任务，那么唯一的做法还是同他缔结一项有效的条约以恢复其原来的权力。况且，他是“唯一能够同阿卜德·卡德尔的侵略势力相抗衡的人”。

但大多数人表示反对有损国家荣誉的放弃，于是摩莱的一些声明也就表示他原来的主张有伸缩的余地了。“谈不上新的征服问题，但是，也不能说：我将到此为止，我将踏步不前，我将仅仅这样做。”——一切要看形势而定。

官方的做法始终是实行有限占领。我们的属地不仅仍然限于阿尔及尔、瓦赫兰、波尼、布日伊和现在的君士坦丁的周围，而且它们仍然是孤立分散的。还谈不上什么“如愿以偿的战争”的问题，瓦莱那一连串立足于部队分散基础上的营地装备，主要是防御性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最近的事件已使形势发生变化，许多看来已经解决了的事情重新成了问题。因此，大多数人还是同意增加费用和人员，自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作好战争准备的庞大工程：如营房、营地、仓库、公路、防御工事和医院。9月份，将修建菲利普维尔[①]，使之成为君士坦丁的天然港。也不再由国家来充当殖民化的企业主，而是瓦莱所建议的，“在土著那里，安置一些移民，指导他们开垦土地，并使移民们自己形成密集的人群”。当谢尔谢

① 菲利普维尔，现改名斯基克达（Skikda）。——译者

勒[1]被占领时，一个百户人家的移民居留地在这里建立了起来。

政府的和平愿望还体现在同艾哈迈德贝伊的谈判上。谈判于1838年整整进行了一年，然而这位虽然已被战败的前贝伊以为别人还在有求于他，从而得出结论：法国人只想脱身，他打算在法国人离开以后再次回到君士坦丁，因而对谈判没有任何兴趣。政府则因疲于战争，不得不同意由法国直接治理它的征服地。9月30日，瓦莱组成了省行政管理机构，由一个最高指挥官领导，在他管辖之下，有一些充任部落领袖的哈里发和卡伊德。这就是在巴黎的人们所称的"通过当地的地方政府"。具有更普遍意义的是，1838年10月31日法令决定使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高级行政管理机构这个新的字眼来表示我们北非诸属地的这一地区。内政署长代替了民政总监，结束了行政长官和总督之间的冲突局面，由于取消了各部门长官同巴黎的直接联系因而总督的权力也加强了。

在这期间，从阿卜德·卡德尔执行条约条款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对他有利的都要求得过分，对

① 一译舍尔舍勒。——译者

他已承担的义务却迟不履行。更有甚者，他在隶属于法国的领土上征收捐税，任命卡伊德。他还搞移民活动，把定居在我们土地上的部落转移到他的土地上去。他在东部尚有争议的领土上征服泽松人，把我们任命的卡伊德处死。他避免妨碍对艾哈迈德贝伊展开的军事行动，以为一旦把这个碍事的对手清除掉，他便可以畅行无阻了。他在为支持比斯克腊的领主法赫拉特·本·赛义德而进行干预以后，立即把艾哈迈德清除掉，即使他亲自出马把艾哈迈德送往远方囚禁起来也在所不惜。在马斯卡腊，我们驻埃米尔方面的领事多马，曾受地方当局的监视，遭到居民的侮辱和他们的酋长的冷遇。

阻碍我们同一些部落进行贸易的米利亚纳贝伊，在答复我们的要求时说，"如果要使这片地区秩序井然的话，那么只有把它交还给它的主人，而我们就得驻守在阿尔及尔的城墙之内。"埃米尔敦促总督"停止照管那些不愿做基督徒的居民"，他想给人这样的印象：法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反对他。其实，他尚未作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工作。1838年8月8日，他写信道："如果我们具备补给物和军

需品的话，我们就不会拖延开战。”法国从这种和平状态中毕竟是得益不大的。人们曾经希望，条约一旦签订，抢劫行径就会停止。但是，尽管埃米尔多次保证，安全仍未确立。

瓦莱忍受了这些无礼举动和僭权行为，他这样做也就说明了政府的意向。政府认为，阿尔及利亚要太平无事，就得象保卫杰米拉等地那样，把社会的安宁建立在辉煌的战果之上。另一方面瓦莱也希望取得阿卜德·卡德尔的同意，修订条约上那些含糊不清的条款，特别是关于边界的规定。为了顺利地安排这件事情，便把阿卜德·卡德尔的蛮横无礼看作是单纯的感情冲动，把抢劫行径视为无法避免的偶然事故，以至于对一名军官的被害也不加惩罚。瓦莱给阿卜德·卡德尔输送武器和辎重，让他用来制服艾因·马赫迪。他强迫一些工人去为埃米尔效劳，使那些到法国人那里来寻求庇护的人又沦为埃米尔的奴隶。

1838 年7月，瓦莱对于有争议的几点，向埃米尔提出了四条新条文。其中确定边界的一条条文规定了东部地区重新划归法国。在草拟的新的条约文本中，保证了我们在阿尔及尔省和君士坦丁

省之间的交通。阿卜德·卡德尔始终没有接见携带这些建议的使者，却满意地收下了送给他的礼品。他承认，条约的文字可能含糊不清，但他对于那些如此有利的原文字样一直拒作丝毫改动。

政府既不能容许埃米尔的僭权行为，又不想使和平破裂，只得迟迟不作决定。摩莱向议会提出了瓦莱建议的四条条文，作为已为阿卜德·卡德尔接受的协议，只是由于埃米尔似乎还不很了解他所承担的责任的性质，因而协议还没有付诸实施。事态依然如故，直至1839年秋天发生事变才迫使政府行动起来。

瓦莱已经决定通过尚有争议的领土，即哈姆扎和比邦山脉的隘道（铁门），建立起君士坦丁-阿尔及尔的联系，借以确定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利和迫使埃米尔接受。远征是秘密进行的。由元帅和奥尔良公爵领导的一个纵队从君士坦丁出发，到达了塞蒂夫，纵队又好象要从这里出发，北上直抵布日伊，但是相反地却直指铁门，于1839年10月28日顺利越过那里。11月2日，纵队在欢呼声中开进阿尔及尔。人们可以在《阿尔及利亚通报》中读到："从此以后，非洲已进入到经历考验的时

期，它永远标志着巨大殖民地的诞生。”

阿卜德·卡德尔认为，越过比邦山脉是明显地违反塔弗纳条约。他先下手为强，说：“我已决定宣战，因为从法国人所做的准备工作中，使我懂得，他们所说的和平是不算数的。我养精蓄锐等待好几年，为的是要对付一个比我强大的敌人。再等下去我将一无所获。”11 月 18 日，他通知瓦莱，已经宣布圣战。有几队人越过阵线，侵入米提贾平原。士兵和欧洲人都遭到了杀害。移民们纷纷自卫，其中一个叫皮雷特的移民，在他的农庄里坚持了整整一夜。但是，由于军队接到命令按兵不动，致使一些农业垦殖区被摧毁了。瓦莱被事变弄得惊惶失措，恐怖气氛笼罩着阿尔及尔。我们的军队，从数量上说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据点过多，兵力分散，不得不撤退。12 月 31 日进行了阿勒格河之战，我们军队奋勇前进，突破了阿拉伯人，这才恢复了我们的信心。

春天，瓦莱发动攻势。他的计划是，把阿卜德·卡德尔拦截在阿尔及尔省之外，逼他退往瓦赫兰尼亚。3 月 15 日占领海滨地区的谢尔谢勒；5 月 17 日占领麦迪亚，接着便是冲锋夺取穆扎亚峰和

特尼阿峡谷，6月18日进入米利亚纳。这三个地方，都驻扎了卫戍部队，但马上又被包围，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必须进行长途跋涉的远征。米利亚纳第一卫戍部队是被疾病搞垮的。瓦莱的职务由毕若接替（1840年12月29日）。

在这踌躇不前的几年中，国家没有从事地区的开发；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无政府状态的殖民化。当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登陆的时候，曾在城外即萨赫勒沿岸找到一些漂亮的庄园——后来遭到士兵的破坏；在米提贾平原找到一批属于德伊、贝伊分区官员和对阿尔及尔市民大有用处的产业。而在事变所造成的混乱中，这些产业被主人们所抛弃，为山地阿拉伯人所劫掠，或为土著佃农所占有。随部队之后来的那些随军商人、投机者和游手好闲的人，摇身一变成了移民。在法国，一些公司组织起来了，但它们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由于当地局势的不安全，买进的土地无法到手，因而在签订的买卖契约中，不诚实的欧洲人受了口是心非的阿拉伯人的欺骗。

克洛塞尔从开始掌握指挥权起，就在这新殖民地上发现了一片富饶的种植香料的土地，他在

梅宗卡雷[①]附近建立了一个典型的农场，后因当地条件不宜不得不放弃掉。继贝特泽讷宣称不可能殖民化以后，罗维戈却表示对殖民化满怀信心。他匆匆忙忙地让移民们去充任雇工和手工业者。一些到美洲去的德国移民，由于未能在勒阿弗尔上岸，人们为了摔掉他们，便把他们运往阿尔及尔。这些移民便被安置在库巴和德利-易卜拉欣的那些“与其说是适应农业需要而无宁说是适应战略需要”的基地上。重新回到阿尔及尔的克洛塞尔，设法招募大批移民，但是他招来的法国人，甚至在租让地上还没有被安置下来，就弄得倾家荡产而跑掉了。这种头脑发热的殖民化，导致行政管理机构甚至把那些是否存在都有疑问的土地也租让出去。

欧洲移民与阿拉伯居民的习俗是有矛盾的，特别表现在邻近牧地可以自由放牧这件事情上，当地的这种风俗习惯，同有效地经营各种产业是不相适应的。土著中有许多人移居到了阿卜德·卡德尔的领地上。反正指挥官对移民越来越不关心。1839年，当埃米尔的一伙人蹂躏米提贾的农业垦殖区时，这些地区已趋于衰败境地。

① 梅宗卡雷现改名哈腊什（El-Harrache）。——译者

二、全面征服（1841—1847 年）

随着毕若的到来（1841 年 2 月），战争的措施和地区的开发，都有了根本的改变。还在 1838 年时，这位新总督还认为阿尔及利亚是“复辟王朝留给法国的一个不祥的礼物”。他被任命为总督后，即改变了他的这种想法。“既然我们在非洲，而且又要留在这里，那就必须占领下来。”作为签订塔弗纳条约的负责人，他在议会讲台上宣称：“事实已为这项条约作出了判断”。只有“对这一地区进行绝对统治，才能实现殖民化，以保持这个征服地”。他在到达阿尔及尔时所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我将是个热心的殖民者。”

毕若不乏敌人。人们把特朗斯诺南街的屠杀案归罪于他，但是开进这条街的不是他的部队①。

① 1834 年4月13—14 日，巴黎工人和站到工人这一边的巴黎小资产阶级阶层为反对资产阶级七月王朝制度、争取成立共和国举行起义，毕若参加镇压。14 日早晨，当主要的战斗已经结束的时候，在特朗斯诺南街上几个还在坚守街垒的起义者却遭到了优势敌人的残杀。虽然这条街不是毕若旅的活动地区，因而他并没有参与这次暴行，但由于人民的痛恨，还是把他的名字同这个可耻的事件连在一起，给他取了“特朗斯诺南街的英雄”的绰号。——译者

人们尤其怨恨他，因为他是用一个企业主的思想感情去对待社会主义的。但是这个个体所有制的辩护人，却曾是资本主义殖民化的敌人。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是自我锻炼出来的。他所受的教育相当平凡，但他是一个思想健全和有个性的人。“事情一旦决定，就得坚持不懈地去做。”他既纯朴老实而又专断固执，他喜欢向初次见面的人阐明自己的想法，但不能容忍丝毫的批评。他的个性势必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由于关心士兵生活，他胜利地指挥过战争；他组织了一个阿拉伯人的政府，尽管他的军事殖民化计划遭到过挫折，但把殖民化同移民活动结合起来，在阿尔及利亚开创了欧洲居民安家落户的道路。

毕若运用以部队的机动性为基础的进攻，来代替以有限占领为特征的防御。既然在阿尔及利亚不存在可以成为生活中心的城市，既然阿拉伯人从来没有把人员众多的部队集结起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而必须以阻止他们播种、收割和放牧来“控制他们的农业”。非洲战争的特点是劫掠性的袭击。夜里，人们袭击天幕村，把男人、妇女、儿童集中起来，把无法带走的

器物纵火烧掉。丧失人力物力的部落就会长期保持“平静”局面。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不这样，战争就会延长，受害者就会增加”。在炽热的太阳或风雪交加——疾病则比敌人更有杀伤力——的气候下，进行丛林战，必然会发生“谁活下去？”的问题，这样却把人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卡芬雅克、佩里西埃、圣阿尔诺曾把拒不投降的部落窒死在洞穴里。在休整的时候，士兵们拿起铁锹、十字镐修筑公路、桥梁，建设村落，从事非洲部队不留名的、无私的巨大工作。

如果不给予阿卜德·卡德尔以打击，战争必将持续下去；七年期间，他神出鬼没，捉摸不定。人们仿佛同埃米尔在玩牌戏，纵队到处搜索，却又常常扑空。有时以远征为借口，实则是为了升官。圣阿尔诺写道：“这就是战争，荣誉万岁！”他终于发现“这场战争打得既不漂亮又无趣味”。一些内容单调但予人以普遍印象的插曲陆续出现了，例如：马扎格兰、斯马拉、伊斯利、西迪易卜拉欣等事件，以及布朗当之死。

一直到1844年，一切都按毕若计划进行。在两次战役中，占领了埃米尔的首府马斯卡腊，摧毁

了他的兵工厂和仓库；埃米尔本人也被赶往南部。这一年，这场远向西部发展的战争，由于避往摩洛哥的阿卜德·卡德尔所搞的阴谋，即挑动摩洛哥素丹参加反法战争一事而复杂化了。毕若在伊斯利河附近击溃了摩洛哥军队；茹安维尔亲王的舰队炮轰丹吉尔和摩加多尔。丹吉尔条约（1844年9月10日）宣布阿卜德·卡德尔为非法之徒。

埃米尔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1845年春，瓦赫兰尼亚的部落又发生骚动，一个新任马赫迪[①]的布·马扎煽动达赫拉山的人起来闹事。9月26日，由于蒙塔尼亚克不谨慎，使他的部队在西迪易卜拉欣遭到屠杀。不久，一支法国分遣队在旷野里投降。阿卜德·卡德尔极力煽起全面暴动，但是他面对着的却是那些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部落的厌战情绪。这时，为我们纵队所追击，被他的最后一批信徒所抛弃的阿卜德·卡德尔，在摩洛哥素丹的部队和阿尔及利亚边境线——由我们部队所控制的一条坚不可摧的边境线——之间遭到夹攻，于1847年12月23日向取代毕若的奥马

① 马赫迪（mahdi），伊斯兰教什一派救世主，此处指阿拉伯部落的首领。——译者

尔公爵投降。埃米尔不在摩洛哥期间，他的哈里发穆斯塔发·本·萨米曾派人杀害西迪易卜拉欣的俘虏，只有很少的人得以幸免。

三、阿拉伯人的政府。有领导的殖民化。(1841—1847年)

1844年2月1日，毕若通过阿拉伯局——情报和行政管理机构——组织了土著政府。军官监督酋长的活动，审理案件，规定捐税总额并确保其征收。军官还要解决并管制劫掠行径，组织土著农民。人们要求这些军官既是战士，又是行政官、法官、技术顾问，并且还得是心理学家。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官员，如拉帕塞、里夏尔、马格里特，就是第一流的人物。随后，在同其下属——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这几位人物——的直接与经常接触中，他们的权力就被各级主管所取代。他们自由行动，除了只受制于自己的理智和道德观念以外，简直无法无天。某些人的失检行为，一般说来，原是应归咎于狂热的冲动。而另一方面，又由于阿拉伯局必须承担的任务广泛繁杂，因此即使他们失败

了也不足为怪。

继无政府状态殖民化而来的，便是毕若的有领导的殖民化政策。虽然内阁首相苏尔特元帅并不坚持实行单一的殖民方式，但他还是认为，只有安家落户的殖民化才能够获得成功。曾经有过一个修道会，即由于斯塔乌埃利的特拉比斯特会的努力（1843年），推行了殖民化，它先是得到军队，随后又得到私人资本的协助而获得了成功。也曾建立过企业的殖民地，但一般说来这只能使那些企业家发财致富而失败了。相反，官方的殖民化却成功了，因为在它所开辟的这块地区，只有国家才具有达成一项集体事业所必需的手段和毅力。1840年，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或者移居敌区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这样一来就使内政署长居约伯爵于1841年所制定的阿尔及尔的萨赫勒地区殖民化纲领得以实现。1845年至1846年间，来到阿尔及尔的有四万六千名移民，其中一千八百八十二名申请租让地。在米提贾平原，第一批欧洲移民安置在有害健康的土地上——死地布法里克，在移民的第一代中，很多人被夺去了生命。

同政府的意见相反，毕若认为唯有军事殖民化才能保证开发阿尔及利亚，而且还能确保和守住阿尔及利亚。他叫他的办公室里的一个职员、一位浪漫主义的野兽狂佩特律斯·博雷尔，就民事移民和军事移民作一比较——前者弊病百出，后者完美无缺。他梦想建立一种士兵移民的“秩序”，迫使移民们受到纪律约束，以便由他们去耕种土地，并修建公用工程。他努力通过“敲锣打鼓式的婚礼”使他们获得配偶。但是这些已经退伍的士兵，既讨厌军事义务，又反对集体劳动。这样，居民的移殖活动，凡以士兵为主的遭到了失败，凡以平民为主的却取得了成功。

国家进行干预是同安凡丹神甫[①]的理论相矛盾的。安凡丹神甫认为，只有得到银行的协助，殖民化才有可能。他的公共工程部队，同工程师军官、上层家族的领袖们在一起，每天得集合汇报，星期天穿上制服，整治土地，然后又把土地让给一些财团。拉摩里西尔曾打算在瓦赫兰尼亚作一次

① 安凡丹，巴特尔米·普罗斯比尔 (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最亲信门徒之一；同巴札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四十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译者

试验，但没有成功。

由士兵——他们在退伍后得到租让地——建立移民垦殖营的计划遭到议会的否决。毕若趁卡比利亚战役胜利请求召回，他于1847年7月5日离职。

到1847年1月1日，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居民，共十万九千人，其中法国人有四万七千多名（1833年，欧洲人居民有七千八百十二人；1840年，有二万七千二百零四人）。新建居民点上的居民增加到九千四百八十五人。在六万二千一百二十六名外国人中，来自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占优势。与之相近的是，有八千六百二十四名德国人和瑞士人，八千七百八十八名马耳他人和三万一千五百二十八名西班牙人。西班牙人是逃避内战和贫困而来这里的，在阿尔及尔上岸以后，在石工行业中找到了一项工作，使他们成为采石工、挖土工、车夫、泥水匠、小酒馆老板，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在瓦赫兰，一万五千一百九十二名欧洲人中，就有八千五百二十名西班牙人，他们提供了主要的和最好的手工劳动力。马翁人在阿尔及利亚开辟园地，安装水车，成功地种植出不少时鲜花果。被建

设法国式城市所吸引来的意大利人，成了企业家、饭店老板、车夫，有的使出他们海上生活的本领，去当渔民、水手、码头短工。语言与阿拉伯语相近的马耳他人，开设一些廉价的饭店和肉铺，进行谷物交易，或者带着他们的母羊，向城市供应羊乳。这些朴素的移民、劳动者或是店主人，在他们同国人之间的互相支持下，在国家并不十分关心他们的情况下，一般都已兴旺起来。

第　三　章

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1848—1870年)

第二共和国是通过设置三个省(有省长、议员和选举产生的省议员)而部分地与法国实现同化，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满意的。1848年6月的那些日子[1]以后，为了摆脱被认为是危险分子的巴黎失业者，政府就把他们安置在阿尔及利亚那些往往不易耕种的土地上，设立了四十二个农业中心。这些农业中心历经重重困难和适应水土方面的种种考验之后，大部分都繁荣昌盛起来了。

朗东总督在卡比利亚进行胜利的远征(1857年)之后，意味着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已告结束。

①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译者

在殖民化方面，一些委员会为了在1846年至1863年进行垦殖，在米提贾平原划出了二十万一千公顷的土地，其中四万五千公顷分给移民，三万八千公顷分给土著居民，十一万八千公顷归国家所有。这是米提贾平原得以发展的起因；但是对土著的土地所有者强制实行的种种新的垦殖法，却使他们成了农业无产阶级。

拿破仑第三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充满了矛盾、善感多变和幻想。1858 年他在巴黎设立了“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部”取代军事体制。两年后，他又取消了该部，恢复军事体制。他先后把阿尔及利亚设想为 1851 年流放犯的徒刑场、我们应该予以“同化”的“阿拉伯王国”——“不止是一个欧洲人的殖民地和一个法国营地”。他给佩里西埃（1863年）和麦克马洪（1865 年）这两位总督的信件中，明确地表达了要成为“法国人的皇帝和阿拉伯人的皇帝”的愿望。他要同“一个聪明的、勇敢的、好战的和从事农业的种族”进行和解，并防止他们反对为数不多的欧洲移民。

在阿拉伯人中间，主要是种植小麦和饲养牲畜；在欧洲人中间，主要是经商、进行工业活动、建

设公共工程和从事精耕细作。面对着三百万土著，几乎只有二十万欧洲人，其中十二万是法国人；他们占有的土地达四十万公顷，如不出租给阿拉伯人的话，其中一部分还要荒芜下去。因此，要推行这样一种殖民化办法是徒劳无益的，租让给"贫穷的"移民的土地愈多，就愈要造成居民的殖民化。皇帝承认，殖民化已经失败，只能自食其果。因此，国家的任务应该仅仅局限于鼓励投资。但这是一种浪费当地自然资源而有利于几个大财团的措施。它们获得了从两万公顷到十万公顷的租让地，却又巧妙地躲避了应尽的义务。它们因此而发财致富，但这无论对法国还是对阿尔及利亚都毫无好处。

参议院颁布了两项法令：一项法令（1863 年）适用于拥有土地的阿拉伯牧民，以便在土著居民中间形成一种个体所有制；另一项法令（1865 年）则宣布，穆斯林土著居民是法国人，但永远受他们的个人法权地位所支配[1]。

---

[1] 1865 年 7 月 14 日参议院法令规定，穆斯林土著就是法国人，但仍受穆斯林法律管辖。根据他们的要求，他们得享有法国公民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受法国民法和政策法令的管辖。——译者

为了防止土著居民与移民发生接触，皇帝把土著居民置于因杜瓦诺案件[1]（1857年）已声名狼藉的阿拉伯局管辖之下。1868年的饥荒夺去了五十万土著的生命——他们多半是军管区内的土著居民，这件事表明，在制度上是有缺点的。这次灾祸，使得法国在1866年规定的农业调查推广到了阿尔及利亚。因此能够收集到欧洲籍居民的受苦情况。1870年3月9日，立法团通过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政体制。一项主要是关于建立特别预算的改革方案已经拟订就绪，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致使该项方案延期付诸实施。

[1] 1857年8月，在瓦赫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阿拉伯局长官杜瓦诺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名富豪的罪犯。恩格斯指出："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员，甚至下级官员平时依仗自己的权势，专横暴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恩格斯：《阿尔及利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09-110页。）——译者

第四章

第三共和国治理下的阿尔及利亚(1871—1940年)

一、阿尔及尔公社。卡比尔人暴动。征服撒哈拉。

第二帝国的崩溃，受到阿尔及利亚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曾经在1870年1月的公民投票中投了否决票，正在从非洲的将军们的失败中寻找报复的机会。一些普通公民，打算取代那些被认为是已经废除了的旧政权，以便采取必要的新措施，他们在主要城市组成了保卫委员会。维耶尔莫兹律师领导的阿尔及尔保卫委员会于9月6日组成，并且与市政府合并。这个委员会与前流放犯组成的共和协会有联系，也许已经加入了国际[①]。

① 指第一国际。——译者

尽管行政当局号召保持平静，但是报刊的叫嚣使一部分居民的情绪颇为激动。相继发生了反军国主义的示威行动，反对那些“卑怯的”将军。身为总督的瓦尔森-埃斯泰拉齐和利什特兰，以及驻在瓦赫兰的索兰，面对骚动都一一逃跑了。阿尔及尔省省长瓦尼埃的绥靖的决心受到了猜疑，他不得不辞职。

从第一天起，阿尔及尔保卫委员会就认为，业已垮台的政府官员再无资格管理政事，它宣布准备取而代之，并要求授予维耶尔莫兹以自由裁决的大权。委员会的代表们同丝毫也不打算放弃特权的图尔政府发生了冲突。总督府既然已经完全撤消，法令也就成为一纸空文。军事总督先后由“三省民政总督”、“共和国特命专员”所取代。阿尔及利亚有了它的议员；在各省，将军隶属于省长。但维耶尔莫兹同迪布泽专员、朗贝尔专员不断发生冲突。因此，政府派拉勒芒将军去结束这种非法的动乱。

尽管维耶尔莫兹已经宣布：阿尔及尔公社与教会分离，取消天主教教会的宗教教育，并改组警察局，但他还是被自己的一帮人所包围，这帮人并

不关心他们领导人所肩负的责任。在那些同样地赞成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分离，或者主张阿尔及利亚与英国联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团中，维耶尔莫兹也很少得到支持。轮到他受猜疑了，而且，由于他和德拉莫雷尔海军少将——已经下令水兵和大炮登陆——发生了冲突，加上他厌恶内战，因此自行引退。况且，他关于组成一个保卫委员会联盟的计划——多半是打算由此产生一个阿尔及利亚政府，同互相敌对的地方观念是抵触的。随着海军上将德·盖东以总督身份来到阿尔及尔——没有引起任何抗议——这样才结束了阿尔及尔公社的历史。

德·盖东必须对付卡比尔人的暴动。这次暴动，最先是由于一个显贵毛克拉尼的虚荣心受到打击而引起的。为了褒奖他的父亲为法国服务，我们曾授予他父亲以迈贾纳哈里发称号；但其父去世时（1852年），他只得到巴什-阿加[①]称号。一些行政措施也使毛克拉尼的利益和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不过，在阿尔及利亚军政府废除之前，他忠

① 巴什-阿加（Bach-agha），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介于阿加和哈里发之间的一种官职。——译者

诚于法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阿尔及利亚军政府的废除，才使他决心进行分裂活动。他以前承认是他上级的那些法国军官都成了战败者。对他来说，决不能服从一个唯利是图者，更不要说去服从一个犹太人了。当他知道克莱米约被任命为部长时，他就是这样宣称的。不过，毛克拉尼一直等到1871年3月14日普法战争结束后才同法国破裂。他并不抱有能够赶走法国人的幻想，但希望通过一些军事行动来表明他的权势，并借此重新获得哈里发的头衔和特权。

4月6日，毛克拉尼——一个月后即被杀死——与强大的拉赫马尼亚人的教团领袖哈达德长老缔结了一项协定。圣战宣布了。但十五万名手持武器的卡比尔人，却内心希望重新获得独立。另一方面，民政体制的建立使他们日益感到忐忑不安，何况他们知道这种体制是应移民的要求而实施的。此外，还由于他们得悉阿尔及尔发生了示威，土著们历来敬畏的一位军人受到侮辱的消息。最后是由于"法国既然是由一个犹太人在管理着，那么它就是微不足道的。"

暴动持续了七个月。它越出了卡比利亚，汹涌

澎湃地席卷霍德纳，延及谢尔谢勒地区，并深入到撒哈拉。农业中心被袭击，农庄遭劫掠。但除了帕勒斯特罗的半数居民被残杀以外，受害者较原先担心的要少些，因为许多移民已从卡比尔人那里预先得到消息。四支法国纵队进行了三百多次战斗。7月13日，哈达德投降，三个月后，最后一批叛乱者被粉碎了。1872年1月，我军占领了图古尔特和瓦格拉。绝大多数的阿尔及尔人和瓦赫兰人，甚至南部的拉赫马尼亚人的清真会馆都没有参加暴乱。

惩罚往往“同罪行不相符合”。除了真正的暴乱头目以外，还随意逮捕受控者，他们被交付给由移民担任陪审员的法庭处置，有时甚至只凭“流传的谣言”就提出控告。卡比利亚失去了自治权。它得缴纳三千六百多万法郎的战争赔款，其中一部分用来赔偿暴动受害者的损失。它还得交出五十万公顷土地，置于政府扣押之下。

卡比利亚的投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史。朗东为确保阿尔及利亚治安，早已在撒哈拉边缘设置据点，以控制商队和劫掠者的通道。1852年，由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搞阴谋，迫

使我们占领了拉格瓦特。1854年，另一个扰乱者本·苏莱曼被赶出了图古尔特，于是，椰枣林正趋衰落的苏弗绿洲，由于我们的设施以及自流井的开凿，使这一地区获得了新生。同年，与阿杰尔的图阿雷格人开始建立关系，终于在1862年缔结了古达米斯条约，但人们并不想从这个条约中得到什么好处。

由于谢赫管区联盟发生暴动，这才阻止了我们向撒哈拉挺进。我们的政策，原先是依靠那个建立在瓦赫兰、摩洛哥和撒哈拉边界的联盟的支持。西·哈姆扎谢赫曾经有过参加我们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作为一个哈里发，在被授予从热里维尔城[1]到瓦格拉城的重大指挥权以后，就把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从这个城市赶了出去，并以法国的名义加以占领。西·哈姆扎去世时(1864年)，他的儿子西·苏莱曼只得到巴什-阿加的称号。西·苏莱曼感到失望，以致听信他周围的宗教信仰狂者的谗言。暴动持续了二十年，在屡获胜利和遭受挫折后，撤离特勒山(1865年)，但继续在南方骚动，直至最后一批分裂分子投诚才告结束

[1] 热里维尔，现改名巴亚德 (El-Biadh)。——译者

(1883年)。1882年，叛乱者的避难所姆扎卜被我兼并。

根据“撒哈拉铁路建设计划”，我们向撒哈拉派出了一些探险队。弗拉泰尔斯率领的第二个探险队，单凭沙安巴的响导们的信誓就从事这项探险工作，结果在1881年遭到杀害。我们没有要求任何赔偿，但深入撒哈拉的行动再度停顿下来。

1890年8月5日的法英协定，承认法国在北非的属地以南地区为其势力范围，这一协定给法国提供了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康崩把南部地区政治行动的统一指挥权集中于总督之手。但此举为巴黎所制止，那里有人担心这样会占领那些被摩洛哥认为是它势力范围的绿洲，因而会引起素丹的抗议。可是，1900年一支地质勘察队的护送队强行占领了提迪克勒特绿洲的主要城市艾因萨拉赫，接着还占领了强盗的巢穴图瓦特绿洲和萨乌腊。1903年设置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边界指挥官”的职务，委交里奥戴承担，因而使这一地区得到绥靖，并使我们能够渗入摩洛哥。铁路已延伸到菲吉格，直至科隆-贝沙尔。拉佩里纳正在中部撒哈拉进行绥靖工作，并训练霍加尔的图阿雷格

人成为沙漠中的宪兵。

1914—1918 年大战期间，一些得到的黎波里塞努西教团[1]支持的德籍土耳其人，对我们最南部的哨所施加压力。德富科尔神甫在塔曼腊塞特被暗杀(1916年)。到1917年末,局势才稳定下来。

阿尔及利亚已通过汽车和飞机同法属西非洲连接起来，撒哈拉不再是一个障碍，而成了法国在非洲各属地之间的通道。由于法国分别于 1881 年和 1912 年对突尼斯和摩洛哥实行保护制，因此它早已确保了阿尔及利亚的疆界，并恢复了原柏柏尔地区的统一。

二、政治制度。经济设施。土著政策。

尽管在 1871 年废除了阿尔及利亚军政府，但最先两位民政总督仍是军人，一位是德·盖东海军上将(1871—1873 年)，另一位是尚济将军(1873—1879 年)。德·盖东实现了前帝国将领们的抱负。尚济与各个部长取得了联系，从而对阿

① 塞努西教团，系阿尔及利亚人穆罕默德·本·阿里·塞努西在 1835 年创立的伊斯兰教团体。——译者

尔及利亚实行了同化工作。阿尔及利亚各省的省议会享有法国本土省议会的权限。阿拉伯人的政府由混合市镇行政长官——穿军装的文官负责主管。阿拉伯局的这些后继者，既承袭了前任们的权限，也继承了前任们所受到过的批评。移民同样地成了众矢之的，正如他们的父辈曾经竭力攻击刺刀统治制度一样。尚济原想当一个“民政”总督，但因实施“严厉”政策，使他陷于同省长、阿尔及利亚议员们发生冲突的境地。尚济被阿尔贝·格雷维(1879—1881年)所取代，后者才是第一个真正的文官。

阿尔及利亚人不断要求在政治上与法国实现同化，这就是说，享有宗主国法国人那样的自由和保障，并受到总督的保护。阿尔及利亚议员们撰写的一些议会报告，为“附属”主张开辟了道路。他们得到了格雷维的支持，尽管格雷维的非常广泛的权力因此会有所削弱。1881年8月26日法令的颁布，实现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同化。阿尔及利亚事务分别由九个部管理，但在各部之间既无联络，而且意见不一，阿尔及利亚事务竟被交给一些不了解阿尔及利亚的官员去处理。总督被剥夺

了创议权，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仿佛只是“一个身居懒惰国王王宫里的殖民督察官”。阿尔及利亚人发觉，宗主国把他们看成是“一家之子，父母为他们花钱，但又不高兴”。既然储蓄和盈余都不花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有什么兴趣去扩大收入、压缩开支呢？可是，他们却又自认为在管理阿尔及利亚事务方面比谁都能干。因此，要求让他们有进行政治活动的自由，有一个地方的议会，并有阿尔及利亚本身的预算，给阿尔及利亚提供各种手段，以获取为它的经济设施所必不可少的财源。

改革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由茹尔·费里这样的人物所主持的1892年委员会的调查，导致了1896年12月31日法令的颁布，这项法令取消了附属制度。从此以后，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代表的总督，在内政部长的节制下行使其行政管理权，其中包括仍然附属于巴黎的各部门，如穆斯林的司法和教育等管理部门。最高行政会议由总督任命的高级官员和居民代表所组成。自由精神还没有达到使阿尔及利亚有一个民选的议会的程度。费里和若纳尔在1892年认为，在民选的殖民地议会中既不存在公众舆论，也不会有共同的利益感，因

为，“对政府毫无希求而又毫不害怕的人”是非常罕见的，至于面对行政当局的移民，也只是“一些在数量和能力上都是无足轻重的群众”。阿尔及利亚最后“必然”会处于两个敌对民族的冲突之中，而唯一能起仲裁作用的有组织的力量乃是总督。

反犹危机爆发了。反犹主义早就潜伏在阿尔及利亚，往往一触即发。那是由于在阿拉伯居民和拉丁居民中具有种族主义观念，加上他们对犹太人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所处的屈辱地位记忆犹新，现在看到犹太人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地大发横财而深感愤激。犹太人按照1870年10月24日法令集体归化后，事实是，往往被迫如同一个家庭那样集居在一起的犹太人，仍然被法国居民看作外人；这样一个孤立不幸的种族——尽管是被上帝所选定——竟敢奢望在阿尔及利亚议会中取得一个犹太人的特别代表席位。由于宗教的盲从和有指导的投票，终于使他们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自1870年以来，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已在许多方面发生过冲突，欧洲人作为善意的旁观者是偏向于前者的。自1896年起，由于象莫雷斯那样

的宣传鼓动，形成了欧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反犹联盟。时机是有利的。当时土耳其人正战胜希腊，这在阿尔及利亚土著中间激起了伊斯兰的优越感。在移民中间因酒业的不景气而使犹太人走运，显得更加盛气凌人，犹太人的平凡职业受危机的影响比较小——不过也存在着贫苦的犹太无产阶级。激动而又变化不多的欧洲居民群众，对暴力行动的号召过于敏感，以致随波逐流，而那些成员不多的反动的和社会主义的政党，则利用这种情况使自己在选举中获胜。犹太人竟被看成是投机取巧的议员的伟大的选民，而这些议员却与一些丑事有关系，就连投他们票的市长们也牵连在内。

1897 年 3 月举行的反对一个以色列教授的示威行动，导致了 1898 年 1 月——由于一名入法国籍的青年马克西米利阿诺·雷吉斯的煽动——在阿尔及尔发生了一些有伤亡的骚乱，犹太商店遭劫，阿拉伯人积极参与了这种活动。在 1898 年的选举中，阿尔及利亚选出了三名反犹的议员（他们在 1902 年落选）。在一个特别缺乏运输工具和资金的地区，徒劳无益的暴力行动实际上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在 1934 年，君士坦丁又发生了阿拉伯

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流血冲突，而维希政府对以色列人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对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人们从反犹骚动中得出结论，要把阿尔及利亚人的活动转到管理其本身事务中去。1900年12月19日法令创立了特别预算。被赋予法人地位的阿尔及利亚，因而就能拥有一些资产，并在议会监督下得以借贷，准许兴建铁路和巨大工程。根据1898年8月23日法令，设立了一个民选的议会和若干财政代表团。在任意划分的各选区所选出的"纳税人代表"中，占优势的是法国人（计有四十八名，但阿拉伯人占十七名，卡比尔人占七名）。在法国人的代表中，殖民和农业方面的代表所占的席位，和分配给其他法国居民的席位一样多。移民和土著之间的区别不久就全部消失，法国人和土著的代表大部分是豪富。这个议会只代表经济利益，并不具有政治性质。它首先被设想为一个单纯的谘询议会，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并通过预算；后来它被责成管理阿尔及利亚的财富，并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议会。从组织情况来看，财政代表团的主要和重大的任务是在四十年内完成了阿尔及利亚

的经济设施。

关于开发这一地区和殖民化方面，法国从1871年起所着手进行的工作是对皇帝实行的政策的一种反动。当时又回复到通过设立免费提供土地的农业中心和农庄来进行移殖居民的活动。有了被扣押的卡比尔人的五十万公顷土地，是容易开始实施这一政策的。1871年6月21日法令，使得从阿尔萨斯-洛林移居到阿尔及利亚的一千一百八十三户得以安家，这一法令，如果说不是在开发土地(这批移民大多是工厂的工人)至少在移殖居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1873年7月26日法令，也是对帝国政策和1863年参议院法令的一种反动，它打算把土著居民从集体所有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成为个体所有者，其所有权将受法国法律管辖。这项新法令是由分属三个不同部门的一大批官员来贯彻执行的；占有成千上万公顷土地的人曾多次被他们课以重税。这项法令“既没有为国家提供它所期待的土地，也没有为欧洲人提供交易的保障”。至于土著居民，集体所有制的取消，使他们有权不再处于那种产业共有的地位。结果是他们每个人都想把

自己的一份土地出售给巧取豪夺者，而后者则要求他们出卖所有财产，因而成了一大片土地的所有者。最高法院 1888 年的命令，停止了上述法令的执行。

自 1871 年至 1880 年，从摩洛哥到突尼斯，殖民化活动推进到马尔尼亚、特累姆森、麦迪亚、奥马尔[①]、巴特纳、苏克阿赫腊斯。它发展到了瓦赫兰尼亚沿海平原、谢利夫沿海平原、达赫拉山、米提贾的东部地区、卡比尔盆地、苏马姆流域、塞蒂夫高原、君士坦丁高原、季杰利地区、格勒马、波尼平原。创设了二百六十四个农业中心，拥有四十万一千公顷土地。与官方殖民化齐头并进的还有自由殖民，这是通过购买老移民的土地而取得其地位的；行政当局以往所安置的老移民主要是因为分配到的土地数量不足(不到十五公顷)而将其出售的。这样就形成了五十到二百公顷的土地所有权，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就利用小佃农进行垦殖。法国居民从 1871 年的十三万人，增加到1880年的十九万五千人；外国居民从十一万五千人增加到

① 一译奥马耳，现改名苏尔古兹兰(Sous El-Ghozlan)。——译者

十八万一千人。其中欧洲籍的农业居民从十万增加到十四万六千人。土著居民从二百四十一万八千人，增加到1882年的三百三十一万人。

1881年以后，官方殖民化进展缓慢。大部分移民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土著居民，只求在规定的五年居住期满后就把它卖掉。关于拨给殖民银行五千万法郎以恢复公地储备金而为此作出重大和“最后”努力的方案，已被议会所否决，因为议会反对官方殖民化，担心这样会侵占土著居民的产业和加剧投机活动。因此，若纳尔在1892年就君士坦丁人的粮田情况作了一次明确的说明。“这些优良的麦田现已出租给土著居民。移民曾经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但他们未能在那里兴旺发达起来。由于阿拉伯人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尽管他们的耕作方法十分落后，但唯有他们才能把这一片广阔的地区加以开发。一度受到抵制的阿拉伯式的耕作方法终于战胜了法国式的耕作方法。”

1889年6月26日法令，为外国人的归化提供了方便，使他们与正宗的法国人相融合。它认定任何一个外国人都会乐意地成为法国人的，除非他表示相反的愿望。该法令使那些定居在阿尔及利亚

的外国人(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特别是西班牙人)都成了法国居民。大批外国人的归化,起初曾引起不安,致使政府断然采取了一些增加法国移民的措施,即加强宣传,对申请移入者加以选择并规定必须携带五千法郎资金,并为法国移民选择条件较好的农业中心地点。由于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财政自主权,使它在1902年得到了一笔一千二百万法郎的借款。1904年9月13日法令,作出了免费让与土地和若干出售原则相结合的规定,那些出售原则是:双方情愿、拍卖、固定价格。移民可以得到多达二百公顷的土地,条件是必须在这租让地居住,并在五年内不将土地转让。1924年9月9日法令把这个期限延长为二十年。殖民化活动扩大到了特勒地区,直达高高原。

直至1920年左右,政府机关对水的问题总是不甚关心。这对阿尔及利亚垦殖面积中一直占绝大多数的粮田来说,就成了主要问题。由于降雨量极不正常,粮食收成只好听天由命;人们竭力用另一种产量比较正常的作物来代替这种古老的基本作物。首先,努力使热带作物适应水土。稍迟,南北战争在美国引起了棉花危机,因此阿尔及利

亚就热衷于种植棉花，而当美棉重新在市场上出现时，这种热情才消失。为国家所鼓励的烟叶种植在它产生了“极大的错觉”之后，当国家专卖局对其成果大为失望转而减少收购时，于是烟业的发展也就缓慢了。

1878年左右，发生了一个有巨大影响的事件。法国的葡萄田因虫害而趋于凋零，因此决定在阿尔及利亚大量种植葡萄。法国的一些葡萄种植者怀着复兴的希望来到阿尔及利亚。一些老垦殖区被改为葡萄产区，这一新作物的种植成功，使得一些城市和居民中心得到了发展。从1900年起，阿尔及尔，直至大军驻防地和外省小城市，都变成了巨大的贸易市场。作为阿尔及利亚葡萄种植特征的是，它依靠信贷机关的借款，也就是以侥幸为基础的。因此，就导致了多次轰动一时的成功和失败，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受危机的影响，还由于人们的大胆，这就势必同银行的求实精神发生了抵触。从1905年起，葡萄虫害迫使移民用美国种的葡萄苗来代替法国葡萄树。葡萄虫害和经济不景气，也引起了以土著劳力来取代欧洲工人这样的变化。葡萄田从1878年的两万公顷，到

1914 年第一次大战前夕已增加到十五万五千公顷。欧洲籍居民在 1876 年约有三十四万四千人，到 1912 年已达七十八万一千余人，而土著居民则有五百五十六万三千人。

和平恢复以后，殖民化处境困难。居民人数的增长不是通过重新开展的移民活动，而是由于出生率的提高所致。国家财产减少了。土地的涨价，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昂贵，使得改进农业中心的工作成了沉重的负担。土著居民拒绝出售土地，人们就想求助于征用，但又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政治反响而犹豫不决；不仅如此，土著居民还向欧洲人买进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以又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在土著居民中间有一种兑换纸币的愿望——纸币再也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了。还因为，他们在法国工厂里劳动，他们的粮食和牲畜的涨价，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黑市的利润，都可以得到纸币。

人们看到，1919 年后，各产业换了所有者。变得富裕的移民，向往着只在大城市里才能过得更好的生活。他们愿以高于战前的代价来出售他们的产业。那些移民的后裔往往为了从事自由职业

而放弃土地。在不少人口多的家庭里，分配给每个继承人的家产，总是不能使他具备为争取事业成功所必需的条件。还存在着一种不安定的感觉，那是来源于曾经到过法国工作的卡比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只把西方的行为准则带回了家乡。所有这些，驱使大批移民转到别处去运用或者更有利地使用他们的财富。可以看出，从1920年起，在君士坦丁省的许多农业中心，欧洲居民的人数已经减少了。

另一方面，人们还可看到，那些土著很不了解资本同金钱方面的收益，也不懂得能够从其土地上获取利润，他们极力减少种种准备性劳动项目，砍伐果树，夷平优美的园圃，改建欧洲式的房屋，以适应他们的那一套生活方式。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只能使法国居民撤离，使农产品减少。此外，某些大田产的发展，又把一些中小型产业排挤掉。

人们把土地出售给大部分是阿尔及利亚籍的新移民，这种活动在不断地缓慢进行时，1931年起，在《阿尔及利亚情况报告》年刊中辟了一个新的专栏，这是为正在衰落中的农业中心而辟的。为保全这些农业中心所考虑的方法是，扩大这些

遭到损害的农业中心，重新安排移民，靠贷款来清理他们的债务（1932年）。

1920年后，继续不断地种植葡萄。新的葡萄种植者大部分就是原来的谷物种植者。1938年，阿尔及利亚种植葡萄的面积达四十万公顷：在一百名葡萄种植者中，94%是中小业主。欧洲的大生产者（6%）占有半数以上的葡萄生产。葡萄的收成从一千八百万公石增加到二千二百万公石，由于完善的酿造术取得了卓越的产酒成绩，这样，通过阿尔及利亚葡萄田的开垦，提供当地土著农业工人的工资即达三亿七千万法郎。葡萄酒的出口量，占全部出口额的半数强。阿尔及利亚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只能向法国销售葡萄酒，可又影响到法国南方葡萄种植者的利益，因此使这些种植者只好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削价求售。一项法律结束了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从上世纪末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一直在发展着，只是在1914—1918年大战期间才放慢了些。就这一点来看，在占领阿尔及尔一百年以后，人们可以说，这是"法国殖民事业的杰出成就"。

文教设施要缓慢得多。从1830年起，许多人

自愿在知识领域里进行研究，他们中有军官、官员、医生、教士，曾致力于研究这个国家及其过去的情况。就在占领君士坦丁以前，政府为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科学探讨，曾成立过一个委员会。它发表了一些著作，如准备在1930年出版的关于七月王朝《一百周年论文集》，就是要把我们对七月王朝所知的材料加以总结。从开始时办过一些中小学以后，只是到了1879年，才在二十年前开办的一所简陋的医科学校之外，办了一些法科、理科和文科的学校，组成一所高等学府。这些学校打算在1909年改建为大学，首先是作为一些研究中心。在成了大学的学院以后，到1955年，曾输送了五千多名学生，其中六百名是穆斯林，他们得有大学文凭——从各种证书到博士学位都有。除一般教学课目外，这些学院还设置北非和东方学特别讲座，还有很多专业学院。除博物馆（美术、人种、考古、穆斯林艺术）外，还设立一所美术学校，1835年创办了一所国立图书馆。由于古物管理局的努力，在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物的保存方面都有了保证。

阿尔及利亚对法兰西文学的贡献，长期以来是由法国本土文史哲方面的旅行者作出的。可是，

不少人只看到东方的平凡主题，即：妇女-棕榈树-单峰骆驼；另一些人则找借口来分析他们的心灵状态。人们所描绘的阿尔及利亚，有时看不到法国人，有时又看不到土著居民。阿尔及利亚的法语作家，模仿法国本土作家的风尚；他们曾是浪漫主义者、高蹈派、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者。在两次大战期间，出现了一些在北非环境中受到启发的法国年轻作家；有些是写实的，另一些是抒情的，他们表达了地中海地区生活的实际情况。最近又有从法国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的柏柏尔和阿拉伯作家。他们所写的富有文学色彩的小说，使我们特别感到兴趣，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小说是从内部去观察土著居民的家庭和生活的，而再也不是从外部去观察这些事物了。

从一开始，阿尔及利亚就曾使画家德拉克鲁瓦、夏塞里奥为之鼓舞，而拉费虽未到过阿尔及利亚，但尽力追忆非洲军的英雄事迹。把注意力倾注在纷纭繁杂的东方事物中的艺术家，则更比比皆是。从 1907 年起，由于总督若纳尔创建了阿卜德·蒂夫别墅，便使一些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得以同阿尔及利亚的大自然和人物形象发生接触。加

入阿卜德·蒂夫别墅的青年艺术家以及其他青年艺术家，发挥各种各样的特长，表明他们力求摆脱在描述故事方面的俗套，从而真实反映出非洲的现状来。

在人的工作方面，第三共和国曾致力于融合阿尔及利亚的各种居民。1871年，它曾让以色列人集体归化，并曾使外国人转而成为法国公民取得成功(1889年)。然而对穆斯林来说，他们自以为有着一个比我们优越的宗教、语言和传统的社会，他们引以自豪的是，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生活；总之，他们的生活不仅是宗教生活，而且是世俗生活，这些都由一部圣书即古兰经所规定。穆斯林认为，接受法国公民资格会使他们承担屈从于异教徒法律之下的义务，从而放弃了他们的个人法权。他们把个人法权看作是这样的情况："他们希望有朝一日会重新成为自由民族，以便保证他们的种族特性。"因此，他们很少要求成为法国公民。

法国的土著政策的特点是，不论是在穆斯林的同化方面，还是在听任他们的社会结构自行演变方面，都迟疑不决，没有坚持到底。相反，在宗教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却从未被否定过。在作过

一些劝他们改变信仰的非官方尝试以后，人们懂得，要使穆斯林改宗是一种幻想。法国不但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增加了这个教门的神职人员，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些事情是该教门过去从未做过的。此外，法国还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把那些只是在表面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居民伊斯兰化。卡比尔人的语言、习俗，都和阿拉伯人不同，我们硬把阿拉伯语作为行政用语，硬把伊斯兰教的法律代替柏柏尔人的风俗习惯。我们的这种做法，似乎是要在各不相同而又敌对的居民中间去实现统一，但这种统一只能用以反对我们，没有其他作用。

在第三共和国统治下，对土著居民的管理，同以前一样，仍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的管理。这个“土著居民管理”制度，使迅速镇压犯罪活动获得保证——人们认为，这正是符合我们国民心愿的。惩戒性的案件，并非由司法当局受理而由行政当局受理。拘留、扣押财物、集体罚款，是由总督宣布的。混合市镇的行政官被授予惩戒的权力。“为了使法官就近审案”，1902年设立了一些惩戒法庭（拥有裁判轻罪的权限）和刑事法庭。

若纳尔于1892年已经注意到，要保证安全，“不在于加强镇压，而在于比较公平地对待战败民族。”然而，当时康崩写道：“有些人试图使未取得公民资格的人去接受最高当局的做法，这些人已经受到公众舆论的批评，他们太少关心未来了。”旨在使土著居民具有共同的权利的措施，始终遭到移民的反对。1892年，茹尔·费里就曾认为，这些人“缺少甚至毫无公心”，他们具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一切品质，却没有胜利者的德性，也没有弱者的正直感”。这决不是因为“移民虐待——按粗俗的说法——土著居民”，而是因为“在心灵深处有难以平息的仇怨、轻蔑和恐惧的激流在翻腾着。”面对着土著居民，“移民就有一种可能会遭受灾难的感觉，但不去考虑采用另一种并不是压制的政策来排除这种灾难”。

移民的观点，曾由阿尔及尔参议员热朗特在参议院陈述过（1894年6月18日）：“只有土著居民才能够为我们提供劳动力，帮助我们大力开发我们阿尔及利亚目前和未来的一切可能有的资源。我们必须使这批居民在某种安全的情况下，为我们效力。而要取得这种为我们的繁荣所必不可

少的安全，只有确实做到使土著居民能适应于一个坚定而公正的政权机关的管辖才有可能。”凡是能使土著居民摆脱被奴役状况的想法——不论是使之受到教育(严格的手工训练除外),或者使之从土著居民管理制度下解放出来，又或者是更重要地给予他们以政治权利，都是不大受人欢迎的。每一个移民，对他自己雇用的农业工人及其邻居的穆斯林，是公正而善良的，但是，“人们从未见过这些移民曾替土著集体去争取正义并给予鼓励”。

1919年，穆斯林的市参议员们参加市长的选举，激起了财政代表们的抗议。人们谈论法国主权所蒙受的“耻辱”和危险。对此，政府特派员曾驳斥说：“这里，我们处在法国的最南部，如要碰我们头上一根头发，这就意味着法国处于危殆之中了。”1937年，某些市政府的罢工威胁，促使撤回了一项关于对某些类型的开明的穆斯林在保持其个人法权的情况下给予法国公民资格的法案。由此可见，这件事进行得相当缓慢，只是由于几位政界人物的坚持要求和某些总督的采取行动，才使土著管理法逐步废除：1914年废除拘留和惩戒权，1930年废除惩戒法庭，1944年废除刑事法庭。

历届政府在防治疾病的斗争中和教育工作中，懂得了对土著居民要实行“精神征服”的方法。为防治1830年前曾经造成过居民灾害的流行病和地方病，1900年起建立了公共卫生的保护组织：创办巴斯德研究所（该所制造血清），还有住院设备、医疗站、殖民地医生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治，巡回女护士，医务助理人员，流动医疗队。

学校的创办是迟缓的。1850年办了一些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的学校。当这些学校由军事管理转归市镇管理的时候，教育事业就衰落下去了。1871年后，民治体制把这些学校看做帝国体制[①]的可厌的残余。1865年有三十六所学校，一万三千名小学生，到1880年，学校下降到十三所，入学儿童为三千一百七十二名。茹尔·费里提出给卡比利亚建立“部办”学校的倡议（1883年），引起了“一片普遍的愤怒声”。对土著居民的教育工作遭到了“猜忌、隐藏的敌意、普遍的怀疑”，这些都来自这样的一种想法，即：“阿拉伯人（土著居民）是一个劣等的、不可教的种族”，因而对他们试行教育是

① 民治体制指1871年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帝国体制指1871年前的拿破仑第三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译者

无用的，阿尔及利亚最高行政会议成员们曾在1894年确认这一点。人们至多只同意给予他们一种目的在于“为移民提供最灵巧的农庄仆人、泥水匠、鞋匠”的实际训练。1890年的教学计划，就是使教育朝着严格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前进的。

若纳尔承认，教育事业要到1900年才初具规模。由于有了特别预算，就得以继续不断地进行努力，但因居民数量激增，所获成就始终跟不上有待完成的工作量。1900年的入学儿童为二万五千名，1914年为五万三千名；到1938年，在六百二十万土著居民中，入学的男孩为八万七千名，女孩则为一万七千名。在同一年中，由于缺乏校址和教师，一百万名儿童无法入学，致使家长不再迟疑地就把他们的儿子、甚至女儿送进了法国学校。

1914年大战爆发前几年，在土著居民中开始形成一种舆论，认为土著居民的行政管理机构转到政治方面去了。被排斥在学校大门外的广大群众的情况，没有多少改变。在法国从古老家族的后裔中选拔出来的卡伊德、阿加、巴什-阿加这些“缠头穆斯林长老”以外，出现了一些出身于法国学校的“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律师、医生、商人。这

些人丝毫也不否认曾从法国得到帮助，他们并且承认法国的主权，不过他们不愿也不能放弃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出于他们自己的要求，成了法国公民，可是这种"转变人物"却被他们的家族所排斥，又被法国人所疑忌。因此，这些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便要求和法国人同化，以便在保持他们个人法权的同时，得和法国人享有同等权利。他们根据法国法律学家在1911年所发表的谘询意见，认定："按照法律，这个要求是可以接受的"。

1912年，征募土著居民的计划，并非只以志愿应征为原则，而也是以容许雇人顶替的义务兵役这种缓和的办法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引起了一些震动，成千的特累姆森人移居外地。那些缠头穆斯林长老，由于担心穆斯林一旦被吸引到法国人的社会集团中去，便将使伊斯兰社会集团受到损失，为此强烈反对这种征募计划。相反，那些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则坚决声称："我们一定要自愿接受义务兵役，因为我们看到，这种征募正是我们所要证明的一种信任的标志。"不过他们却也要求撤消土著居民管理制度和改变欧洲人同穆斯林之间的纳税不平等状况，还要求实行普及教育，在一

些民选的议会中增加他们的代表名额。一般欧洲人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对独立的向往，于是，欧洲人就谈论起穆斯林的民族主义来了。

1919年2月4日法律所规定的改革，在立法者的思想中，是以大战期间土著居民的忠诚为根据的——从1916年的骚乱始终局限于奥雷斯山区一事可以证明。所有并未取得公民资格的穆斯林，从今以后，得以选出一些代表，以和法国人同样的名义和同样的权利参加阿尔及利亚议会。凡年满二十五岁并服过兵役的穆斯林，或业主、商人、官员和持有大学文凭的穆斯林，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纳税平等实现了。他们同法国人一样被允许担任公职和国家雇员，但主管职务除外。为了简化手续，这项法律还对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给以便利，但得放弃原有的个人法权。

1914-1918年大战，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广泛传播。埃米尔哈莱德，即阿卜德·卡德尔的孙子，掀起了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随后转而要求土著居民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他的肆无忌惮的言论，引起了法国人的反对，并使和他同教门的保守

分子感到恐慌，以致他不得不离境出国。

伊斯兰教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地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改革派。人们看到从越来越多的人中，从互相敌对的民族集团中涌现出要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的倾向。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贤哲会试图进行的工作。伊斯兰教贤哲会是1931年经总督府批准成立的，由于该会主席、长老阿卜德·哈米德·本·巴迪斯的威望，这个组织很快地取得了“信仰的捍卫者”的声誉。

对本·巴迪斯来说，建立一个国家所凭借的是宗教、语言和对过去的自豪感。只要一个民族没有丧失掉这些，即使沦为奴隶，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因此，他传播一种排除迷信的宗教；他仅仅承认一种语言——古兰经的阿拉伯语。最后，他唤起对过去的回忆。他激起了马拉布特的反对，而他则谴责他们是利用人们盲从的剥削者。同时他也激起了另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是根据自己的要求业已成为法国公民的穆斯林教师；对这批人来说，“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的前途，是同现在、而且仍将留在北非的法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

伊斯兰教贤哲会出版刊物从事宣传，它的一

些法语机关报，以1789年原则[①]的名义，要求让穆斯林同“三色旗下的其他儿子们”享有同等权利，因为他们承担着同样的义务。至于那些阿拉伯语的刊物，则以马格里布的光荣历史同目前成为殖民地国家的穆斯林的屈辱状况去进行对比。穆斯林应该使他们的伊斯兰正教同欧洲的技术知识相结合，以便能用相等的武器去和西方的精神作斗争。本·巴迪斯想要避开法国所有的政党，并声称反对“北非之星”的过激主义。“北非之星”是由巴黎地区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在法国组织成立的，随后成为梅萨利·哈吉领导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它同共产党勾结，双方都想互相利用，直到1936年破裂为止。

本·巴迪斯还想要唤起“沉浸在静止状态中”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他“按催眠术家的方式”行事，要他们每天重复这样的话：所谓马格里布文明的低劣性，是捏造出来的，是马格里布的压迫者强加于它的。为了有助于民族复兴，出版了一些阿拉伯文的阿尔及利亚历史。在这些历史书中，文献资料

① 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即在1789年《人权宣言》中所宣布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译者

和批判方法方面所占的位置，要比所引用的传说和民歌差。这些作品的目的，在于为马格里布文明辩护，颂扬那位捍卫柏柏尔独立的英雄朱古达[1]，树立民族自豪感。这类书仿佛是用一种“兴奋剂”的方式写出来的。本·巴迪斯祝贺书的作者“在使过去复活的同时，为年青一代确定了未来的方向”。

人民阵线[2]的胜利，使伊斯兰教贤哲会转而进行政治活动。1936年6月，穆斯林大会同时通过了保证对法国的忠诚以及撤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机关的决议。作为替代的办法是：实行普选，实现法国人和穆斯林之间的政治平等。这次大会造成了某些骚动，阿尔及尔的教长——法国的老部下被暗杀了。

派往巴黎的一个代表团没有能使法国政府同意这些要求，于是改革派只得要求在保持穆斯林法权的情况下取得法国公民资格了。勃鲁姆-维奥

---

① 朱古达(约公元前154—前105)，努米底亚国王，以抵抗罗马侵略著名。——译者

② 1936年由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和激进社会党联合组成的阵线。选举胜利后，成立了以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为总理的人民阵线内阁。——译者

莱特法案[1]只给他们以部分的满足，即对于认为"最先进或对忠诚作出重要保证的"某几类土著给以法国公民资格。本·巴迪斯宣称接受这个法案，同时，还有待实现如下目标的普选：使"全体穆斯林无条件地归并到法兰西大家庭里去"。这个党派的一些报纸写道："你们（法国人）是注定要被淹没的，或者被侨居法国的那些来自地中海岸的外国人所淹没，或者被我们所淹没"。

当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由于遭到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的反对而由政府撤回时，阿尔及利亚祖国这个主题，便在本·巴迪斯的宣传运动中占了首要地位。他的那些自称既是穆斯林又是法国人的信徒，都得公开认罪，因为"阿尔及利亚民族并不就是法国……它有自己的祖国，即阿尔及利亚"。同化的阶段过去了。"我们不愿意同化，因为同化是不可能的，因为同化使我们丧失个性。"是绝对的独立吗？不，"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保卫我们的独立"。那么我们希望什么呢？希望"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保护下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

[1] 指前法国总理勃鲁姆1936年上台后和当时的国务部长维奥莱特制订的一项法案。——译者

这不过是第一个阶段。而本·巴迪斯还看得更远，认为：获得了自由的阿尔及利亚要同解放了的摩洛哥和突尼斯结合在一起，重建阿卜德·穆明[①]的阿拉伯-柏柏尔帝国，北非则要加入建立在开罗和麦加的阿拉伯帝国，从而成为应该统治这片土地的哈里发属下的行省之一。

目前，伊斯兰教贤哲会的宗教改革已经达到了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地步。原来的提法是："把腐败的东西变得健康，把弯曲的东西弄直，把迷路的人引上正道"，这些话改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但是，1937 年 7 月穆斯林大会曾重新提出 1936 年 6 月的要求，并宣布阿尔及利亚"处于戒备状态中"，在那以后，就出现了一些分裂分子，他们反对本·巴迪斯长老过于着重政治性的宣传。1940 年，本·巴迪斯去世后，宗教活动就转而居首要地位，不过在 1943 年的《宣言》中，可以看到，他们重新提出了祖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的主张。

① 阿卜德·穆明（1100-1163 年），穆瓦希德（一译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建立者。——译者

第　五　章

1940 年到 1953 年的阿尔及利亚

1940 年 6 月，虽然已经停战，阿尔及利亚却有可能紧跟着一位决心继续进行战争的领导人。然而，几个星期以后，贝当元帅取得了胜利，民族革命以及作为其化身的战士军团也取得了胜利。7 月 2 日，代表团团长说："我们大家都曾进行过殊死抵抗。然而在阿尔及利亚，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遵守停战这个事实，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力求为阿尔及利亚争取更好的处境而行事"。

新的体制[①]得到了大多数居民的赞同。有一些拥护这个体制的人——一种神秘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把元帅当作一个天命的、绝对正确的人

① 指 1940 年 6 月法国政府投降希特勒后在法国中南部维希地方建立的以贝当元帅为首的傀儡政权，即所谓维希政府。——译者

物，他是在拯救法国。也有一些始终置身于政权方面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想从中取利。此外，迫害犹太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来说，是他们天生的反犹主义的正当行为。最后，那些作为强大政权的支持者、社会秩序及既得财富的保卫者的移民，掌握着经济实力，其影响在一个没有公共舆论的国家里足以起着支配作用。

总督和省长依靠强大的警察力量——警察总监承认，当时人们都被卷入告密成风的浪潮里——迫使人们尊重这个体制。单凭指控揭发，一般官员、工人、曾发表过不符合当局意旨的言论的嫌疑分子，就会遭到打击，被交付法院审理，或被关进集中营。规定犹太籍小学生入学最高限额的做法，毫无理由地加强了。有一个高级官员，竟别出心裁地于1943年把十万名土著居民运往法国，去为德国人的机构进行劳动，这个计划直到盟军登陆才被停止。至于部队干部，由于他们早就被许给物质上的好处，并对元帅作过宣誓，因而坚持他们的忠诚。

政府代表魏刚将军以及他去职后就任军队总司令的朱安将军，执行了元帅保持北非完整亦即

防御任何人进攻北非的命令。按照命令,该在1942年11月执行的方案是:对入侵突尼斯的德国人按兵不动,而相反地却要对盟军作战。魏刚向占领当局表示:他没有充分的力量去防御戴高乐分子和英国人的攻击,企图使非洲军能获得增援。他的对抗行动阻止了维希政府去接受那个已由海军上将达尔朗批准的议定书——允许轴心国占领宾泽特港;德国人也采取报复措施,拒不同意增强实力的要求。朱安将军在贝当案件的证词中指出:"魏刚离职以后,北非的事态并无改变。"

魏刚及其后继者所采取的立场,是对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的立场,实际上,这个中立却是片面的。维希接受同德、意武装力量"并肩"作战的原则,人们已经预见到轴心国的军队将在英国人阻击下撤向突尼斯,而非洲的法国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不是解除他们的武装而是接待他们。阿尔及利亚向隆美尔[1]的军队供应粮食和器材。意大利的船只可以自由出入法国领海,这时发下来的命令却是射击越境的英国飞机。

[1] 隆美尔(Erwin Rommel, 1891-1944),德国元帅,1941-1943年为德国非洲兵团司令。——译者

大多数居民是“观望派”，对局势无动于衷。停战委员会预征阿尔及利亚物产的措施，由于官方的软弱无力和公众的漠不关心，得以顺利进行。在所有的观察家看来，居民对于那怕是有损于他们感情的外国的干预，都不会有什么反抗。

既然阿尔及利亚没有被敌人占领，那里的抵抗运动也就从未带有在法国所采取的形式。抵抗运动只是个少数派组织，它把贝当体制的受害者、一些并未遭到过个人损害但对迫害的措施和取消共和国的主张进行谴责的人结合在一起，这些人在拒不承认1940年6月17日的停战以后，更不愿接受同敌人合作。

法国司令部的“中立”，使阿尔及利亚无法防止轴心国对非洲的侵袭。要防止这样的意外事件只有法国军队依靠准备好的外来协助及时抢先开到才能做到。这并不是军事领袖们的工作，而是北非的抵抗运动的工作。抵抗运动的行动，在于设法配合盟军登陆，这揭开了开辟世界大战第二战场的序幕。

魏刚同美国代表之间，曾于1940年11月开始谈判，借以保证北非粮食、纺织品和液体燃料的

供应。对魏刚来说，谈判严格地限于经济方面。而对美国人来说，谈判目的是要避免“可能引起种种混乱的崩溃状况”，给居民打气，以争取他们的同情，这样做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在实行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得以“保全无数美国人的生命”。最后，这也可以使美军中负责监督的官员一面对船上货物从起卸一直到分发给消费者进行监督；一面又随时观察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情况——这个地区既是一个极好的探听站，又是一条掩蔽达喀尔、法属西非和大洋彼岸的南美洲的防卫线。

1941年2月26日魏刚和罗斯福总统的代表罗伯特·墨菲签订了几个协定，其结果是，由美国陆续运送大约十万公吨的各种物品：石油、食糖、煤炭、棉织品、茶叶。关于这个微不足道的谈判结果，墨菲写道：“我们只是把一根胡萝卜在一头驴子面前摇动罢了”——这事可以拿英美经济战争部门的反对态度来说明；对这些部门来说，联合国家的利益在于“阻止轴心国取得一切给养，使北非陷于匮乏的境地中”，因为这个地区“已成为英国封锁的一大缺口了”。据那些美国的经济战争部门说，1941年，在拨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而

在地中海各港口卸下的五百万吨物资中，竟有60—80%落到了德国人手里。

在墨菲-魏刚谈判之外，从1940年起，还进行过另一些秘密谈判，为的是着手同美国合作，以达到由美国来重新武装非洲军的目的。这些谈判由博弗尔上尉开始，因他被捕而中断，随后又在抵抗运动组织以外，由五人团（勒梅格尔-迪布勒伊、里戈、亨利·达斯蒂埃、范·埃凯、圣·阿杜安），以及充当军事顾问的儒斯上校一起重新谈判。在政治方面，北非转到了抵抗运动一边去，但不是转到分裂分子一边去——人们甚至存在着可能同维希谋取协调的幻想。五人团的活动同伦敦的戴高乐委员会无关。同墨菲的这些谈判持续了将近一年，达成了在盟国直接参预下单纯重新武装非洲军的计划。1942年7月24日，为了从背后狙击向埃及前进的隆美尔的部队，同时也为了开辟作为攻入欧洲的序幕的第二战场，盟军参谋部决定起草一份“在美国司令指挥下的盟军攻入北非的计划（托尔奇战斗行动）”。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司令。1942年10月24日，在谢尔谢勒附近的一次秘密会晤，抵抗运动的几位军事代表同美国司令进行

了第一次直接接触。但是，美国司令只是在登陆——登陆的日期定在11月8日——前四天，才告知登陆的确切日期。

毫无疑问，法国司令将会执行元帅下达的命令。因此，问题就在于避免法国人和应召即将与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军之间的流血冲突，或把这种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目的，抵抗运动有限的人员的主要任务是要使反对登陆的阻力无法活动。他们应在必须完成登陆任务的几小时内，坚守拉巴特、瓦赫兰、阿尔及尔以及那些极关重要的据点：各电话局、警察分局、民政机关和参谋部门所在地，并使忠于维希的那些领导人无法活动。

这个受阿尔及尔卫戍部参谋儒斯上校节制的配合性军事行动，在瓦赫兰，由于当地抵抗运动军事首领的失职而没有成功。在拉巴特亦是如此，那里的贝图阿尔将军想要说服诺盖而不是扣留诺盖，结果，他自己却遭到了扣留，被送交军事法庭。相反，在阿尔及尔，一些抵抗运动的非军事人员，在11月8日深夜十二时半，伪装成"要塞志愿兵"，和正规传令员一起，顺利地拔除了一些哨所和掌握了所要占领的据点。第十九军团司令和省长无

力抵抗；被孤立起来了的朱安将军，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同达尔朗一起被孤立的。墨菲跑来告诉朱安说，一支强大的美国军队已经友好地登陆了。急于同法国军队会合的这位将军，依赖着他的上司达尔朗，而达尔朗则宣称：只有得到元帅的许可才能行动。这样，阿尔及尔的保卫工作总算组织起来了，可是既然已经瘫痪了几个小时，这项工作也就做得迟缓而杂乱无章。战斗——诚然是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战斗，还是发生了，这主要是由于在西迪费鲁希湾登陆的美军前进迟缓所造成的。当晚，他们到达阿尔及尔，战斗停止了，盟军立即占有要塞和海港，这是将在突尼斯展开战斗行动所不可少的基地。有两名抵抗运动战士——德雷菲斯和皮亚福尔——被杀。前者是一个没有携带武器的军使，是被第五轻骑兵团的一个下级军官杀死的，这个军官还为此得了奖。皮亚福尔阻挠炮轰盟军，被防空部队司令打得半死，这个司令随后也被打死了。

从 1941 年起，美国就致力于谋求同一位具有无可置疑的威望的法国军事首脑的协作。这有种种原因，其中最合乎客观现实的一个原因是，美国

认为，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是反德的，然而也是拥护贝当的；在美国看来，戴高乐不可能有机会把爱国的法国人团结在一起。因此撇开自由法国的领袖，而同“五人团”达成了协议。戴高乐同样和美国保持着距离，他只是在已经实行登陆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美国人所中意的人物是魏刚，可是他拒绝了——“象我这样的年龄，再也不当分裂分子了”——他们终于同从德国逃出来的（1942年4月）吉罗将军取得联系。吉罗这个名字，是忠于元帅的同义词。他就叫他在非洲的代表马斯特将军去同那些并不靠拢戴高乐的军官们结合在一起。可是11月8日，在阿尔及尔登陆的美国人，在那里找到的不是吉罗——他在三十六个小时前已去直布罗陀，梦想能被承认为盟国联军总司令；而他们找到的却是达尔朗，达尔朗于前晚到达阿尔及尔，来看望他的患病的儿子。

就美国而言，“胜利应以最快的速度和美国人最低的生命代价来赢得”。因此，有必要尽快结束法国人和盟军之间的敌对行动——这种敌对行动即使在阿尔及尔已经停止，但在瓦赫兰和摩洛哥还在继续。达尔朗作为法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和元帅未来的继承人，是唯一可以使部队服从其命令的人。到11月10日晚上，北非停火了。

当吉罗被其他一些法国将军看作叛变的时候，那些使盟军在阿尔及尔登陆获得成功的军官们，也恶运临头，等待着维希根据达尔朗的要求撤消他们的法国国籍。达尔朗处于战败者的地位，可是他的协作又是胜利者所必不可少的。他同克拉克[①]将军交换意见，直到11月14日由于和维希的公文来往而中断。最后，这位海军上将由一个俘虏的地位一跃而为驻非洲高级专员。他由一个帝国委员会协助，这个委员会由诺盖、阿尔及利亚和法属西非总督夏泰尔和布瓦松以及吉罗组成。他宣称以元帅的名义行使职权，可是元帅恰恰已经不信任他了。维希的体制在北非继续下来，一些高级行政人员仍然保持原职。而且，五人团中的三个成员立即参加了达尔朗政府，可见达尔朗同抵抗运动参谋部已有联系。至于抵抗运动战士本身，那些已经在11月8日暴露了身份的人，就更加前所未有地出头露面，但他们并不对盟国抱有信心，他

① 克拉克（Mark Clark，1896— ），美国将军，因突尼斯和意大利战役（1943-1945）而出名，1952年任侵朝军总司令。

们说，盟国“无意干预那些只关系到法国人的事情”。

法国军队尽管同美国人重新联合，可是它的首长们却自以为他们通过宣誓同元帅结合在一起。据认为，既然法国已经完全被敌人所占领，那么国家元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况且，元帅是同意达尔朗的做法的。未来的前景是，不但要解放法国，而且还得由元帅另外作出别的措施。至于法国将军们，当他们的指挥权一经被确认，他们就抓突尼斯方面的工作。到那时为止，照维希的指令来看，早已把突尼斯的领导人弃置不顾了。埃斯特瓦总督以中立来掩饰自己。就这样，使德国人能够在无抵抗的情况下牢固地立足于突尼斯。至于宾泽特的海港和要塞，则早就由海军上将德里安交给了德国人。

在突尼斯战役（1942年11月19日—1943年5月10日）中，装备不良和给养不足的法国非洲军队，通过沉重的损失保持了它的昔日声誉，最后以敌人的投降而告终。

达尔朗由于他过去的行为而为戴高乐分子所憎恨，又由于“背叛”元帅而为贝当分子所厌恶。虽

然他"满足了美国人"，但美国人却只把他看做是一个"临时的权充者"，因此，这位当事人曾抑郁地把自己比作"一只柠檬，一旦被挤完了汁就被扔掉了"。他也说过要退出官场生活的话。但是，如果他的在职并不妨碍保皇党、那些属于高级专员公署的以及依附高级专员公署的秘密捣乱分子的计划——这类计划是使那位巴黎公爵在北非执政，妄图恢复法国王位——，那么他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还是会继续留任下去的。王权的复辟只能通过帝国来实现。"达尔朗阻碍这条道路，就应被清除掉。"12月24日，这位海军上将被那年轻的博尼埃·德拉夏佩尔杀害了——凶手看来在精神上受到激励。那些与凶手同伙的人——凶手曾希望他们进行大力干预来保全他的生命——终于撒手不管他的命运。案件没有经过预审而只作了简单的查问身份就开始了。这次审讯是一出滑稽剧。凶手自称没有同谋者，别人却要防止他翻供。12月25日晚凶手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早上就被枪决。至于保皇党的这种逸出常轨的举动，遭到了盟军和吉罗的反对，吉罗宣称：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企图。

新任高级专员吉罗是一位爱国者，尊敬元帅

的人、但缺乏政治判断力。他于 1943 年 3 月 14 日颁布了三项作为其政府根本大事的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维希的法律无效；但另外两项法令却又宣布这同一个维希的现行法规以及那些业已取得的地位和作出的裁决都是有效的。阿尔及尔政府所关心的是，同美国人取得协调就得推迟戴高乐将军的来到非洲，可是将军终于在 5 月 30 日到达那里。

6 月 3 日成立了代表中央权力机关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未被敌人占领的领土上行使法国主权，并在领导战争方面作出努力。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轮流担任主席。此外，设置一些委员，执行部长职权。11 月 6 日，委员会补充了各政党和各抵抗运动组织的一些代表。9 月 17 日则已组成临时协商会议，用以代替议会。

1943 年 1 月安法会议[①]时，罗斯福和邱吉尔曾试图使吉罗和戴高乐达成一项协议，以此作为爱国的法国人团结的象征。可是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几个月中，却把吉罗逐渐地排挤掉，

① 安法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现名达尔贝达）附近。这次会议通称卡萨布兰卡会议。——译者

首先是取消委员会的两主席制，随后是撤消他的一切军事指挥权。这并非只是两种主张之间的冲突——因为一种主张一直支配着另一种主张，而主要是由于吉罗坚持其错误态度的结果。他确信民族革命原则的优越性，确信维希的体制有其支持者，他还设想那个被认为人数不多的抵抗运动是会服从元帅的。他又只从等级观念去考虑局势，而没有想到他自己应该听凭他过去的部下——戴高乐的支配。最后，他认为自己是不受政府的管辖和监督的。1943 年 3 月，他曾受到阿尔及尔居民的欢呼，不到一年之后，他就失宠了。他的失宠，无论在公众中或美国人中，都没有引起反响。1944 年 8 月，戴高乐和已被盟国承认为法国唯一政府的阿尔及尔临时政府进驻已经解放了的巴黎。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政策的演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改革派领导人的思想状况改变了。1936 年，改革派领袖费尔哈特·阿巴斯在反对他的老师本·巴迪斯时，曾写道："我不会为阿尔及利亚祖国而死，因为这个祖国并不存在。" 1946 年，他却发现了这个祖国："我

们已经不走那些过去常走的小路，而要走上争取阿尔及利亚祖国亦即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

这种演变，由于事态的发生而加速了。在土著居民看来，法国的战败使法国衰弱下去。反之，土著居民在1942年11月对作为大西洋宪章发源地的美国的强盛，印象很深。要使需要盟国支持的积弱的法国去接受民族主义者的合法要求，在时机上显然是有利的。法国准备同意放弃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这也使民族主义者的这种希望得到鼓励。

1942年12月，达尔朗和吉罗要求穆斯林政治领袖们推动居民为战争作出努力。费尔哈特·阿巴斯趁机使他的同僚签署了一份《致法国当局书》。“这场战争不是一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各族人民的解放战争。虽然他们许下了种种诺言，而他们自己也已作出不少牺牲，可是阿尔及利亚各族土著居民还是被剥夺了如其他居民所享有的那种基本自由和权利。穆斯林的意见是愿意和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通过新的牺牲。因此，法国方面必须通过一些显著而迅捷的设施来显示它的改革决心。为此，召开一个包括议员

和所有穆斯林组织的代表的会议，制订一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规章，以此作为纲领，使群众领悟自己的权利，并了解他们有为战争而努力的义务。”

由于这个文件未获答复，二十八名穆斯林议员——其中有费尔哈特·阿巴斯，便于1943年2月10日签署了一个《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他们宣称：从盟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以来，当法国人之间，即共和党人、戴高乐派、保皇党人、以色列人之间，竞相争夺权力时，大家似乎无视七百多万名土著居民的存在。宣言的签署人不愿意在没有土著居民在场和背着他们的情况下去决定他们的命运。

此外，他们认为，他们绝不否定他们所接受的法兰西文化。相反，他们正是从法兰西的道德、精神的丰富宝藏及其自由的传统中求得他们行动正当的论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谴责作为非正义和罪恶渊薮的殖民制度，他们把这种制度看作是对法兰西文化的这些原则的否定。人们曾有计划地对某些人实行同化政策，对另一些人则拒绝适用，从而使穆斯林社会到现在还处于被奴役状态中。这样，阿拉伯-柏柏尔人虽然有其数量上的优势及其应享的权利，可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却处于被

牺牲的地位。如果说阿尔及利亚已经有了民主制度，那也仅仅使胜利者受益而已。同样，也只是为了满足胜利者的急切需要，才修建了公路和铁路。

殖民化的特点是，使整个种族，包括它的人力和物力，全都从属于仅占少数的法国人和欧洲人。殖民化的飞跃发展，是建筑在对那些部落的巧取豪夺的基础上面的，胜利者的法律使这些部落丧失了它们最好的土地。这种状况是征服的结果，为了反对征服，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曾经英勇地坚持她的生存权利。法国人花了二十七年才结束了阿拉伯-柏柏尔农民为保卫土地、自由和宗教而进行的抗争。军事征服由于压倒了战败者而取得了胜利，经济征服则是完成了这种奴役。大批土著小业主成了广大穷苦不堪的无产阶级。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处于被掠夺和被奴役的地位，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倒象是外国人了。

然而，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从来不计较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凡是法国所要保卫的地方，穆斯林都流过鲜血。虽然如此，但是按照殖民制度，他们却始终被排斥在法国人的社会集团之外。他们申请加入这种集团的要求始终被拒绝，这就

使他们对同化政策灰心失望，而现在，他们认为，同化政策不过是为殖民化服务的一个危险阴谋罢了。而且，殖民化只是保证仅占全体居民八分之一的一个阶层得以过舒服生活。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取消殖民制度。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别无所求而只想成为一个穆斯林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在结语中，《宣言》要求取消由一个民族去剥削另一个民族的殖民化；要求给予阿尔及利亚一部宪法，来保证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居民的自由和平等，保证言论自由、结社权利、普及教育和政教分离；最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要切实参加自己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由人民产生，按人民的利益办事。人民承受一切牺牲，但是人民期望不再用诺言而是用事实来保证他们的未来。总之，正象费尔哈特·阿巴斯后来在1946年5月所阐明的那样，问题在于：在1943年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法国人和穆斯林都享有公民权，而并不减少法国的照管权。"

穆斯林经济研究委员会召开了。3月26日，阿巴斯在会上以《附件》的形式提出了一个简明的

改革纲领：应立即将总督府改组为阿尔及利亚政府，政府部长由法国人和穆斯林各半充任。总督作为政府首脑，他将是拥有大使衔的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高级专员。采取从两种居民中用单一的征募方式建立一支阿尔及利亚军队。最后，关于阿拉伯文学语言以及教学和社会改革采取的措施，阿拉伯文学语言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没人懂得，但并不妨碍它和法文同样成为官方语言。战争结束后，即建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国家，它的宪法将由阿尔及利亚全体居民普选产生的阿尔及利亚立宪会议来制定。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重视这个纲领。迫于经济形势所实施的解决办法，要长时期才能见效，委员会打算在政治上按照一些文件进行调整，寻求能使土著居民立即感到满意的办法。人们不谈法国军队，而说的是吉罗的军队和戴高乐的军队。戴高乐军队的名额，原很不足。戴高乐想在穆斯林那里发起一个参加他的军队的大规模运动，1943 年 12 月 12 日，他在君士坦丁允许给某些类别的土著居民以法国公民的权利，对他们原有的个人权益不加限制。1944 年 3 月 7 日的法

令[①]，是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引伸，实现了这些诺言。到那时为止，反对穆斯林取得法国公民资格的障碍被排除了。其他类别的人仍然不是法国公民，但他们在一个特别的选民团中有投票的权利。就这样，政府坚持实行了曾经被移民和土著居民抵制过的同化政策。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离开阿尔及尔，移民们就传说，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措施，“没有得到那些构成法国永恒要素而同阿尔及利亚的土地连结在一起的人和法兰西帝国干部的同意。只要作此决策的人一经远离，这些措施就会消失或者改变”。至于穆斯林，他们宣称：“法国错过了所有的

① 1944年3月7日法令规定：

“穆斯林法国人年满21岁的男子，属于下列范围者，均得以个人名义申请为法兰西公民，并与其他非穆斯林法国人登记在同一选民册中，并享有选举权：

旧军官；具有下列证件者……；国家、省、县、公共或接收机关的现任或退职的公务人员或代理人……；商会和农会的新旧成员；巴什-阿加、阿加、卡伊德……；现任或担任过财政代表，参议，现任市参议员或缙绅会主席；荣誉勋章会成员；解放组织的成员；抵抗运动奖章获得者；军事奖章获得者；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或曾任工会委员会成员……；现任或曾任劳资协商委员会的委员；陪审员；现任或旧任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土著福利会（S. I. P.）管理会议的成员；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土著福利会分会的新旧成员。”（第三条）——译者

机会，现在可太迟了”。

阿巴斯获准发行了一种报纸，成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这一党派，它后来改为“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通过广泛的宣传，散播了“阿尔及利亚国家”、“同经过革新的法兰西共和国结成联邦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阿尔及利亚自治共和国”的思想。阿尔及利亚不与法国分离。“阿尔及利亚作为个体加入法兰西联邦和联合起来了的各族人民的范围之内”。这个政策是“新颖的、真挚的，它是综合的、明智的产物，它考虑到法国的最高利益，考虑到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最高利益，但是，我们人民的生活权利和享有尊严的权利，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地在混乱和暧昧的状态中被牺牲了”。然而，广大土著群众却不很了解这些不负责任的宣传家所滥用的激烈言词的奥妙之处。对这些头脑单纯的人来说，联邦制的考虑是毫无意义的，而当同他们谈到自治的时候，他们所理解的是，使法国人撤走，实现完全的独立。结果是爆发了柏柏尔人的旧式的排外事件。

1945年春，已经预料会发生一些严重事件。5月1日，阿尔及尔和瓦赫兰，在警察和一些要求释

放梅萨利的示威者之间曾相互开枪射击。5月8日，卡比利亚的巴博尔山区发生了骚乱，又在塞蒂夫地区出现了流血事件，而且蔓延到君士坦丁以东。阿尔及利亚其他地区没有出事。运动并不只是指向犹太人，这还是第一次。一些装备良好的凶犯不分青红皂白地野蛮屠杀法国人。正象在1868年饥荒时想要做的那样，也正象1934年在君士坦丁集体屠杀案件所做过的那样，总督府对1945年的事件和对这些凶犯所采取的方式，一概保持沉默。人们不知道总督府曾采取过什么措施来防止这种屠杀——其迫害真是残酷。

阿巴斯于1945年5月8日被捕，1946年3月，宣布对他予以不起诉处分。他立即在一份《致法国青年和穆斯林青年的号召书》中阐述了他的立场。他要求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清除“殖民主义的潜在意识和征服者的骄横态度”，这些都是对整个阿尔及利亚社会集团的障碍。他也要求穆斯林抛弃“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念”，谴责“象一种时代错误似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同新的法国自由地联合在一起”的新的阿尔及利亚，将是一项法兰西和穆斯林的民主政治事业。1946年6月，在君士

坦丁的选举中，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在十三个席位中赢得了十一席。8月9日，阿巴斯提出一个阿尔及利亚新体制的方案，这个方案比《宣言》的《附件》更强调自治。

"不要同化，不要新的主人，不要分立主义。人民继续进行其革新工作，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结成联邦"。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自治共和国，共和国的居民——法国人和穆斯林，都具有阿尔及利亚的公民资格。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和国旗。结合在法兰西联邦内的这个国家，对于包括警政在内的一切内务问题，拥有完全的主权。对外关系和国防事务，和法国一体，归联邦政府主管。由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所产生的阿尔及利亚议会有立法权，由议会表决预算，对法国所同意给予的补助和信贷的使用进行监督。

行政权由一个政府来行使，政府由代表大会选出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统和协助总统的内阁所组成。法国派驻一名经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同意的总代表。这位代表在取得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下，有权发表咨询意见，"指导阿尔及利亚政府、向政府提出建议并注意到领土的外部安全"。在这

个方案中，还存在着联邦制的唯一迹象是，要实现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组成一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联邦这样的远景。

这个方案未经议会审议，议会通过了政府提交的阿尔及利亚组织法规（1947年9月20日法令）。在那个法令中，阿尔及利亚被确定为法国海外省的一个组合体，被授予财政自主权和一个由法律所规定的组织。在行政管理方面，没有任何改变。取代1945年已被撤消的代表团的财政会议，则改组为阿尔及利亚议会，其中一百二十名代表，分别以相等名额代表两个选民团。一个选民团是由按照法国民法规定的四十六万四千名公民所组成，另一个选民团是由按照他们原有法规的五万八千名法国人-穆斯林所组成。后者包括约一百二十万名非公民的选民。

议会的权限，主要是在财政方面。它经管阿尔及利亚本身的产业和利益。它审查和表决预算；开征或取消捐税。有关商订借款，特许提供服务和兴办公共工程等事项，必须由议会作出决定。从立法观点来看，除了那些不得不适用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律以外，议会可以作出一些决定，把宗主国

的法律，无条件地或在适应当地的情况下，在阿尔及利亚推行。

阿尔及利亚议会不是一个决策机构，而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因此，它受到总督府的一定监督，它所作出的决定，要得到中央权力机构必需的认可才有作用。

这个起初同样地被穆斯林民族主义分子和移民们所反对的法规，后来被移民们接受了。在第一选民团中，法国公民们为支持"联盟"的候选人而投票反对"分立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在实际上排除了那些进步的党派，把极大多数的类似过去的代表团那样主张大规模殖民化的代表和辩护士送进议会。在第二选民团中，由于弃权的选民人数较多，致使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只能代表选举团体的少数。政党领袖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协调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妨碍了团结。这同一个世纪前一样，当时阿卜德·卡德尔想把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对法国人，没有取得成功；同样，费尔哈特·阿巴斯试图结成一条统一战线，也遭到了失败。这条统一战线可能成为一个出奇的联盟，它包括：主张在"由法国同意给予贷款和补助而获得财政支

持”的情况下实行自治的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而对此法国人则将自愿或被迫加入的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最后还有梦想实现泛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教贤哲会。1951年又作了同样的尝试。由这些同样的政党建立的“阿尔及利亚保卫自由阵线”被人说成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从1945年起，领袖们消失了，一些政党瓦解了。本德杰卢勒博士领导的穆斯林议员联合会也不存在了。一些曾经签署《宣言》的人脱党而去。他们之中某一个人的转变，就会成为官方显要人物。尽管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内还留着一些新入法国籍的党员，但穆斯林党员却脱离共产党而加入了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这个党是由梅萨利·哈吉创办的，用以取代他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梅萨利的被判处刑，使他赢得了殉难者的声誉。他虽然同法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却一直保持着从事地下活动的策略手段和采取直接行动的突出爱好。

这些政党面对不可能实现协调，认识到竞争的集团在反对分立主义分子方面必须团结一致。

至于第二选民团中各选举团体的摇摆不定，更表明选民之间的不协调。在选举中，起先是把多数票交替地投给宣言党和梅萨利派。可是第三个政党出现了。1948年4月，它把在法兰西-穆斯林联盟旗号下选出的大多数议员送进阿尔及利亚议会，这个联盟的选票大体上是同第一选民团的选票合并在一起的。1954年1月议会部分改选时，又一次显示出民族主义政党之间是缺乏团结的。

在第二选民团的选举中，出现一些怪事。有时大家一致投某一个候选人的票，使那些同他竞选的人得不到相当数量的票。有时，一个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名列前茅，而在再次投票时却由于失去了他原来的十分之九的选票而落到了末位。"令人担心的是，选举会被极端分子弄虚作假，行政部门的参预，使他们干出这种勾当"。

1947年的法规，曾赋予阿尔及利亚议会根据有关立法文件来实现某些改革的任务：穆斯林的宗教同国家分立、阿拉伯文的教学工作、穆斯林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些文件，已责成第二选民团拟订，这样做是合适的。可是在宗教问题上，传统派和改革派总是争论不休，无法达成协议。阿拉伯

文的教学工作也没有进一步组织起来。至于有关穆斯林妇女投票制的改革，则遭到了家长们的普遍怀疑。最后，法规还规定取消混合市镇，这一点终于在1956年实现了。

就阿尔及利亚来说，首要的问题是，人口有规律地大量增长和生产品不足之间的日益严重的不平衡。早在1938年，生产品已经不再能保证居民的生活需要。纺织工业才开始创办，远在上次大战期间，整个阿拉伯牧民实际上早就赤身裸体了。1948年的户口调查，表明比1936年增加了一百四十四万一千人（其中欧洲人为五万三千人，土著居民为一百三十八万六千人）。

姑且不谈撒哈拉沙漠，阿尔及利亚是一个贫瘠的地区，只有北部有一部分较好的土地。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为土著居民所占有，其中大约有十五万户往往占有很多的田产，有十万户没有足够维持生活的土地，有一百万户（农民和农业工人）则完全没有土地。除了穆斯林大业主的田产按欧洲方式耕种外，生产的特点是不正规化，收益低，技术落后。每公顷的产量只有法国人那里的九分之四到九分之五。由此可见，要使阿尔及利

亚自给自足，得采取三个解决办法：使国家工业化，扩大耕地面积，把生产效率提到最高限度。修建十一座大堤坝（1920年的计划），蓄水四亿六千万立方米，可以保证灌溉十万公顷土地，可是到1946年才只完成了一半工程。另有八个大堤坝，预定随后修建，但是堤坝水库遭到了淤泥壅塞的威胁，人们曾预先制定过一个引导水源、兴修小型水坝、分洪和掘井的计划。

1937年，人们曾致力于使土著的生产方法现代化，使农民得以保证获得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为了不至于推翻几百年来的传统习惯，人们只限于作些尝试，“以便使有关方面确信改变习惯的好处”。由于在大战期间情势严重，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在阿尔及利亚范围内”，兴办事业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总督伊夫·夏泰尼奥制定了一个全面计划，目的在于加速各族居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在土著福利会方面，建立了一些农村居民中心，来安置农民及其家属，向他们进行农业教育。这些居民中心将成为基层单位，吸收附近的居民中心参加进来，借以建立一些农业改进区。向垦

殖的农民提供一批性能良好的机械器材，由他们轮流使用，以便开垦自己的土地。对农村居民的这一改革，又以实行一项新的住房政策而得到完善。在上次大战前，有人曾考虑过用土著认为具有最好生活条件的小屋来代替不卫生和不方便的阿拉伯的简陋房屋。1930年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某些地点进行过试验。其目的主要是在殖民化的中心旁边修建一些村庄，由农业工人和小手艺工人移居过去，“以便把移民们所必需的劳动力在当地定居下来”。这种安排，“从改革的实用性质来看，是刻不容缓的”。大战以后，土著的住房问题是从“社会”角度加以考虑的，这就是修建一些使受益者出钱最少的个人或集体的住宅。

受到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鼓励的改革计划，不只限于土地的开垦。“阿尔及利亚已卷入一场加速演变的普遍性运动中。”这不仅涉及到改善物质生活，也涉及到改善社会生活。人们设法提高个人和集体的自觉。农村改进区在对农民进行农业教育的同时，还将是社会演变的策源地。农民在他们的共同活动中，将感觉到他们利益的相互连带关系。这样，他们也将为管理用他们的劳力开发

出来或得到改进的地区作好准备。一个从 1947 年到 1951 年分阶段进行的市镇行动计划，预定要建立一些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和作为市政中心的新的市镇，这将导致那些混合市镇的淘汰。

1863 年的参议院法令，曾把部落改为由杰马[①]治理的天幕村，杰马由军事当局任命的显要人士组成，随后(1919 年)改由选举产生。1937 年 8 月 29 日法令，把天幕村作为介于它和混合市镇之间过渡的市政中心，但仍为混合市镇的一部分。市政中心的杰马被授予由市政会议所行使的几乎全部的职权。最后，1945年 8 月 29 日法令，赋予市政会议主管人以监督权，而到那时为止，监督权一直是属于省长所有的。这种地方分权是市政中心趋向自治的一个步骤。这一演变的结果，将是“农民阶级在法国法律范围内的解放”。

阿尔及利亚过去曾有过一些工业(地毯、刺绣、木工)，后来逐渐衰落了。人们努力兴办职业教育，招收艺徒和建立手艺工场来恢复这类产品。1945 年，区分两种不同的手工艺，一种是艺术性的，“它

① 杰马 (djemaâ)，阿尔及利亚地方基层的传统谘询机构，一般由地方名流组成。——译者

体现城市的需要”，另一种是实用性的，“它得为农村提供所缺乏的小型工业。”乡村的职业教育中心和手艺工场的区域中心，向手艺工人传授技术。艺徒满期后，就可得到土著福利会手艺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不但可以在那里领取垫款和原料，而且也可确定他的劳动将按质量来支取报酬。目的是要使得手工艺摆脱过去那种单纯的模仿，以恢复它的艺术传统，还要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并保证这种产品的销路。

人们想要促进的这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改善，个人和集体的自觉性的提高，意味着必须做到使所有的人都能受到教育。1943年，在一百二十五万名学龄儿童中，有十一万零六百八十六名(其中二万二千一百零一名是女孩子)受了初等教育。耽误入学的后果越来越严重。1944年制订的一个学校计划，预定在二十年内设置可以容纳一百万名小学生的二万所学校；但是五年以后，即在1949年，计划的执行遇到了建设拨款不足和合格教师数量不足的困难。原定在1954年设置的六百所学校，不得不推迟到下一年才增加到一千二百所。可以说，行政部门在这一方面进行的速度，同

人口的年度增长率是不平衡的。

面临危机　1947年的法规颁布以来，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同那种激进的土著舆论——它受到推动着全世界殖民地人民走向独立运动的鼓励——相对比，是显得保守的了。

人们打算修建表彰阿卜德·卡德尔的纪念碑，来满足民族主义分子的愿望。阿卜德·卡德尔把法国人赶出阿尔及利亚作为他的唯一目的，一直到不得不放弃斗争时他才停止活动。当地长官作出这种姿态的主要结果是，引起了那些酋长后裔的不满，他们曾是忠诚于我们的，即使在冒生命危险的时候，也是忠诚于我们的。

相反，行政部门由于渴望把大多数的顺从当局意旨的人安排到各级议会中去，严重地干预选举，并向民族主义分子表示，他们的选票抵不上官方的联合票数。这就使人们陷于困境之中。可以预料，那些极端分子会试图用暴力来摆脱这种困境，而某些土著群众由于境况穷苦，也乐于用暴力去支持他们这样做。1954年11月的那些事变，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惊愕。

第六章

暴动

(1954—1957年)

事变 从1954年6月以来,人们看到在奥雷斯山区有一些从突尼斯被驱赶出来的阿尔及利亚武装叛乱分子。27日,据报告,在特贝萨地区曾同一支保安队开火。这些叛乱分子专门袭击农庄,以便轻而易举地获取粮饷。10月,莱奥纳尔总督声称,这类事件"是一种单纯的盗匪行径,而不能说是一种有组织的政治行动"。经过三个月的骚乱之后,1955年1月28日,这位总督在阿尔及利亚议会上对局势作了这样的总结:"基本上说来,整个局势已经安定。虽然在一些地区(奥雷斯山区)我们的行动还不宜迟缓。但就其他地区而言,我们早已脱离开始时的那种警戒状态了。"后来的事实却否定了这种乐观主义的论断。

1954年7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大会上，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最后分裂了，8月26日，软禁在尼奥尔寓所的该党领袖梅萨利·哈吉，令人在他举办的报纸《阿尔及利亚自由报》上宣布解散中央委员会，并开除包括胡基奈·拉胡勒在内的八名领导人，指责他们是温和主义。这些被开除的“中间派”，则在阿尔及尔举行大会进行回击，大会以梅萨利实行独裁政策为理由撤消了他的职务。他们的报纸《阿尔及利亚民族报》谴责暴力方式，认为“争取立即改革的斗争同争取解放的斗争并不是不相容的”。在占有党的档案材料，特别是党的经费方面，梅萨利派和中间派之间曾发生过一些争执。

为了达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目的，梅萨利打算进行地下活动，来结束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无所作为的状态。进行这场战斗的是“特别组织”——1947年建立的秘密恐怖组织，它开始由卡比尔人埃特·艾哈迈德领导，随后由一个退伍的准尉军官、瓦赫兰人穆罕默德·本·贝拉领导。1949年，他和一个退职电车司机、君士坦丁前议员穆罕默德·赫德尔曾在瓦赫兰中央邮局成功地劫取了三

百万法郎。他们因此被捕和判刑，但是赫德尔逃到摩洛哥，经西班牙到达开罗，就在那里同从卜利达监狱逃出来的本·贝拉会合了。

当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分裂时，特别组织的那些突击队员表示，既反对梅萨利派，也反对中间派，认为这些人是纯粹的政客。在开罗，本·贝拉同赫德尔和埃特·艾哈迈德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在该委员会内却总是不能取得协调。本·贝拉在1956年7月写道："赫德尔和埃特·艾哈迈德并不比其他人更值得尊重。他们象过去的那些政治领导人一样已经堕落了。资产阶级化了的赫德尔是一个烂透了的人……"。在开罗，这位退伍准尉军官成为埃及政府所信任的人物，并同阿拉勒·法西(摩洛哥)和萨拉赫·本·优素福(突尼斯)建立了一个北非暴动参谋部。

当本·贝拉和已经获得释放或大赦的"特别组织"的老同志——如该组织君士坦丁的前任领袖布迪亚夫等——重归于好时，他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新的地下组织——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后来改为民族解放阵线。但还有待于制定一个纲领。作为"停火"的先决条件，法国必

须直截了当地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性。独立自然就会随之而来。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可以这样选择：或者成为阿尔及利亚公民，或者保留法国国籍而具有外国人的身份。阿尔及利亚被分为六个战区。战区首领必须接受开罗参谋部的命令，同时也享有某些行动的自由。那些大胆果敢的军官甘冒他们自己被部下搞掉的风险，对别人实行强迫命令，并清除那些不听话的人。之后，又建立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全国委员会及联络与执行委员会。恐怖组织在法国如同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发展得很快。

本·贝拉在开罗找到了一批从巴格达军事学校训练出来的突击队军官，这是在埃及避难的年迈的劳吉[①]阿卜德·克里姆[②]从1947年起开始招募的。这些军官成了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暴动的骨干，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对他们的成绩很感兴趣，他在1954年开罗出版的《北非的命

① 劳吉（rogui），指在摩洛哥意图推翻素丹的人。——译者

② 阿卜德·克里姆（1881—1963），摩洛哥人，曾在里弗起义反对西班牙和法国殖民主义。1926年失败被俘，流放于留尼汪岛。1947年在解回法国途中逃往埃及。1948年宣称继续为反对欧洲控制北非而斗争，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工作。——译者

运»一书的序言里指出，这次暴动只是历史赋予埃及承担的任务中的一个插曲。“凭着埃及的地位，这一任务支配着北非大陆，不会是徒劳无益的。要我们放弃我们援助的责任是不可能的，要我们推卸使我们的文明得以发扬的任务也是不可能的。”

外国人曾对暴动给以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援助。开罗电台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派遣教官和提供武器。1956年10月，“阿索斯”号轮船——船主是一个苏丹人，船长是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希腊人——在摩洛哥海岸某个据点卸货前不久被扣留，查出一批从亚历山大港运来的、足够装备几千名叛乱分子的军事物资。纳赛尔排除正统的梅萨利派和在开罗出现的分裂分子，只承认本·贝拉和民族解放阵线为唯一的政权。

在阿尔及利亚，人们原期望1955年1月由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挑起骚乱，但叛乱早在两个月以前根据来自开罗的命令爆发了。《阿拉伯之声》宣告“北非爆发了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阿尔及利亚解放起义”。1954年10月31日夜晚到11月1日，特别是在奥雷斯山边缘（巴特纳、比斯克腊、亨谢拉）的君士坦丁人中，在卡比利亚、达赫拉的阿

尔及尔人中发生了种种暴行。一些警察哨所遭到了袭击，挨了炸弹，并被纵火焚烧。第二天，一位法国小学教师和一位卡伊德被杀害。这些暴行是一些小股部队干的，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地区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奥雷斯（犹如部族仇杀之乡的卡比利亚）这个难于进去的群山地区，历来是那些非法之徒（犯谋杀或潜逃罪的人）的避难所。此外，那里柏柏尔人的排外性历来相沿成风；同时又是一个贫困地区，这是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很快地就超过了随着水土流失而日益缩小的土地所能提供的产品。虽然 1879 年和 1916 年的暴动，使人把奥雷斯山区看作为一个敏感的地方，但为了驾驭分散在这个混乱的地区的几万名居民，法国人在这里还是留驻了一名行政长官和一、二名助手，由一些人数比法国任何一省都要少三、四倍的宪兵和一些多少已经丧失威信的卡伊德来协助工作。沙维亚人生活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中，除了和一些路过的旅游者——这些旅游者把他们看作是异国情调的怪物——以及来自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非法之徒有所接触外，他们同外界别无交往。这个地区是招募暴动人员的有利场所。暴动给这

些一无所有的人带来了生存的希望，因为军饷可稍微减轻他们的贫困，诱致他们进行冒险和战斗。

暴动就这样开始了。对于叛乱者来说，战争时要避免阵地战，而实行游击战，丛林战。在丛林战中，战斗人员总是搞得惨无人道。埋伏战使平民和军事人员受到了同样的损失。这主要是犯了破坏公民权的罪行(谋杀，残害，放火，怠工，破坏葡萄园、果树、农业物资，烧毁农庄和学校，强征捐税，敲诈勒索)。暴动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反击，正规军的这种反击往往是残酷和过分的，这就成为恐怖和镇压的不断循环。1956年1月，阿尔贝·卡米[①]在阿尔及尔发出了动人心弦的号召，以便“在目前形势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保全法国的和阿拉伯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个号召没有立即产生效果。

在初期，由于法国兵员不足，致使暴动因采用恐怖行动而深入到某些地区的天幕村里。凡是有向法国人通风报信或同法国人维持良好关系的嫌疑的穆斯林均被处死。叛乱者一旦废除了由法国

① 阿尔贝·卡米（1913-1960），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1957年，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任命的那些官长，就把这个地区掌握在他们手中，以此为生，横征暴敛。叛乱者的管理机构建立起来了，进行审判，特别是征收捐税，这些新主人从来不想去改善被他们强迫统治的人们的命运。

叛乱者过去很少有机会试图搞统一行动。但是，1955年8月20日，即废黜摩洛哥素丹周年纪念日，在科洛、菲利普维尔、圣夏尔、阿鲁什、君士坦丁、艾因阿比德、韦德泽纳蒂、古努德的各规定地区，全都在中午同一个时间内发动袭击。叛乱者把当地那些装备不良、自愿或被迫参加和有狂热信仰的农民，甚至妇女和儿童推到他们的前头，同时狂奔乱窜地拼命叫喊："埃及军队登陆了！"或"美国同我们站在一起！"穆安津[①]从阿鲁什清真寺尖塔的高处发出屠杀的号召。叛乱者可能打算占领一个中心，或许是占领一个地区，他们便在那里宣告他们拥有主权，这样就有可能，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将会承认它是一个独立国家。这种惊人的结果并未得到。组成突击第一线的农民伤亡惨重，

---

① 穆安津（muezzin），意为宣告者。伊斯兰教清真寺内按时召唤信徒作礼拜的专职人员。礼拜时，穆安津登宣礼塔高声宣礼。——译者

而叛乱者则逃往科洛山区和埃杜格山区。靠近菲利普维尔的哈利阿，欧洲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甚至从九个月到四岁的孩子都遭到屠杀。叛乱者除了大肆屠杀之外，没有得到其它结果。从此，惊慌恐怖的情绪笼罩着这个地区的人们。

1955年9月30日，联合国大会根据阿拉伯-亚洲国家代表的控诉，以多数票通过把阿尔及利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叛乱者可能受到了这一成就的鼓舞，在瓦赫兰西面的几个据点（特累姆森、马尔尼亚、奈德罗马）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攻势：放火焚烧、屠杀法国人和穆斯林。1956年5月8日，在贝尼萨夫和里奥萨拉多的邻近地区，也同样发动了一次攻势。第三天，君士坦丁北面的三十六个村庄都遭到了袭击。然而，诸如此类的进攻是不多见的。

谋杀事件逐渐地遍及阿尔及利亚。在一个地方被追击的一伙人，又重新出现在另一些地方，除了制造越来越多的不安宁地区之外，没有其它的结果。虽然在某些地区，葡萄架和果树被锯断了，可是在另一些地区，农业设施却还能依靠必要的土著劳动力修建起来。虽然一些土著狙击兵逃跑

了，但另一些狙击兵仍在英勇战斗，如在瓦赫兰的塔法拉乌伊就是这样的情况。

开始的时候，法国军队不适应游击战。它在这种以庄严的名义进行的战斗行动中弄得疲惫不堪。军队要为未来的作战进行训练，运载笨重的作战物资深感困难，而又没有作为侦察用的直升飞机这些基本工具，它真象是用汽锤去打蚊子。我们取消了那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扫荡战，但是我们的军队要进行反游击战的训练，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为了确保优势，还得派遣大量的援军。先在奥雷斯山，接着又在卡比利亚，成立了一个民政与军事的统一指挥部，才逐渐地把这些地区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落在军队身上的任务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既然目的是要绥靖这个地区，那么军队就得完成一项心理方面的任务：消除居民恐怖和猜疑的心情，恢复对法国的信任。一位长官曾说过："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转变人心"。为此，建立了"分区防卫制"，这是一种反对叛乱分子、恢复同居民接触的防御体制。

训练一批执行这一任务的人员是必要的。

1955年9月26日创立的阿尔及利亚事务局，就是为了训练一批领导特别行政区的军官。他们在某些天幕村执行的任务是：借助于由部分士兵和从居民中招募来的后备兵组成的保安队，来保护这些天幕村，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加以指导，以关心天幕村的生活，而在公用工程方面则征求他们的意见，如：蓄水池或学校的修建地点，道路建设等等。虽然曾有过一些挫折，几个军官被害，但从这种动人的行动所取得的结果来看，总是令人满怀希望的。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士兵们的保护下收割庄稼。

民族解放阵线认为通过武装斗争就能定局的企图，既然只是一种幻想，于是它就改变策略，这表现在一些大城市里重新搞起了恐怖主义。从1954年11月起，君士坦丁、波尼以及其它一些城市，一直使人担心着会发生某种突然袭击的杀人案件。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大肆活动。从1956年1月起，谋杀事件越来越多；穆斯林和法国人同样都成了被害者。在受到重则处以断肢的威胁之下，穆斯林不得不停止反抗活动。他们被强制不得再把子女送到学校去。大学生被

责令罢考。除了有 98% 的儿童参加了六年级的入学考试以外，口号一般都能得到贯彻。穆斯林商人还不得不在某些日子和某一特定时期停止营业，违者课以沉重的罚金，他们每月还得被迫缴纳强制性的捐税。这些捐税由民族解放阵线的收税人征收，但这些税款并不都能充作预定的用途。曾经拒绝缴纳什一税的电影院老板受到“惩罚”，炸弹在他们的电影院爆炸，造成伤亡事故。

为了反对法国人和有仍然忠于法国人嫌疑的穆斯林，就加紧进行对个别人的谋害。这种谋害行动是由雇佣的杀人犯——其中某些人只有十五、十六岁——组成的小组或单独进行，每天用自动手枪射击那些柜台里面的商人或碰到的第一个过路人。虽然有的事件可能是为了报复算账，但是大部分谋杀案只是为了得到奖金，或是以打靶子为乐。其明显的目的是，煽动对欧洲居民的不满情绪，挑起盲目的复仇。这样人们就会被卷入长期的内战中，从而向全世界证明，法国没有能力来维持阿尔及利亚的和平。

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很少人对法国人有这样强烈的反感。相反，这些随时给居民带来威胁的

谋杀，却使某些人感到愤懑。在人们所能想到的一些人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原会把他们引导到较有理智的反应，却显示出一种悲观失望的心情。就在阿尔及尔，那里的形势从未紧张过，而一些官员和大学教授坚决要求调回法国，情愿被委派担任低级的职务。这样一种丧失职业责任感的惊慌情绪，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的。如果政府不采取适当的方法来制止这种流行病，那么在法国本土就不会有人自愿去阿尔及利亚担任工作了。

杀人者的暴行之外又有炸弹的爆炸。最初用手工制造的炸弹是原始的，但不久它的威力加强了。从1956年9月到1957年1月，一些相当猛烈的爆炸事件，有时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发生，而且偏偏是在无轨电车站、汽车站、咖啡馆和运动场人群最多的时候发生，造成大量的伤亡。在阿尔及尔和郊区，那些制造炸弹、冲锋枪、自动手枪、军需物资和炸药的真正军工厂被发现了。

恐怖分子在技术上能得到这种改进，看来是由于人数不多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恢复了活动，而且在进行地下斗争的训练。1945年阿尔及

利亚民族主义被取缔之后，共产党便起来反对塞蒂夫起义，并对镇压保持沉默，——当时共产党在政府中派有代表；接着，每个党都设法利用其它的党，出现了同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贤哲会进行和解的尝试。1955年夏天，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再隐瞒它利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联盟来实现反对法国的意图。"共产党人应当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以便在胜利之后，党能够作为重要的对话者，参加关于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谈判。"

1955年9月12日，政府宣布解散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这并没有中止党员们的活动。1956年4月5日，他们中间一个名叫亨利·马约的见习生，把他负责驾驶的一辆军用车交给了叛乱者，并参加了游击队；两个月之后，他在同我们军队的一次遭遇战中被打死。共产党把他作为烈士来赞扬。从那时起，阿尔及利亚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立场。当1957年1月由民族解放阵线指挥一次八天的罢工时，一份传单谴责这次罢工对商人和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民来说是破坏性的，而储藏了粮食的资产阶级则继续在"填饱他们的肚

皮”。民族解放阵线被一伙“野心勃勃、自私自利的青年”领导着。唯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由一个真正的革命学派所创立的，将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走向独立”。

梅萨利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在法国组织了一些示威游行，借以表明党在进行活动。在一些传单中，他攻击民族解放阵线的行动，指出它的领导人是一些投机分子，依靠阿拉伯国家中千百万人为着事业而捐助的款项在开罗过着舒适生活。他又否认民族解放阵线有权认为自己是阿尔及利亚“光荣”解放的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要起这样的作用，就得把这种权利交还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交还给它的“不平凡”的全国领袖梅萨利·哈吉。在这两个集团的支持者之间，虽然成见很深，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代表在联合国幕后同时进行活动。

从1957年2月起，军事形势有了好转。但军事行动仍在继续进行，这主要是由于叛乱分子从突尼斯和摩洛哥获得了人员和武器的支援。幸而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阿尔及尔才消除了恐怖活动。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被捕的民族解放阵线

领导人多数被处死刑。1957年1月的罢工令，只在一部分地区被执行。儿童重新上学了。在联合国，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都遭到了挫败，但这没有妨碍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在宣布准备同法国政府进行谈判方面，比民族解放阵线抢先一步。

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反应　人们谈论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和宗主国的许多法国人，他们根据参加议会的阿尔及利亚某些代表的说法作出判断，认为在阿尔及利亚确实存在着大富翁。人们相信，欧洲人拥有绝大部分肥沃的土地，然而这些肥沃土地的70％（占九百七十万公顷中的七百万公顷）却掌握在土著居民手中，此外，土著居民还拥有十分之九的牲畜，三分之二的橄榄树种植园。至于那些殖民化的巨头，法国人也好，穆斯林也好，他们只是为数极少的拥有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人，尽管为数极少，但他们占有的产品却达到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财富既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就使他们具有一种国家必须重视的影响。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小移民、官员、商人、职员、工人，大部分人的平均收入比在

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要低20%。

在这种居民中，存在着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移民”的思想状况。正如茹尔·费里在1892年所说的那样，它是夹杂着一种恐惧心理的蔑视。欧洲人经常以一种略带轻蔑的亲昵态度来对待土著居民，毫不重视他们，这样有损土著居民的自尊心，即使时间很长也难于医治这种创伤。在导致当前危机的种种原因中，难道人们可以说这些举动是无关紧要的吗？

面对着暴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首先感到的是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其次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所拥有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一直被认为是不够的。即使是最小的事件，也往往被用以攻击政府机关的一种借口，而不考虑提出一些有效措施。

在那些为土著居民着想而提出的改革中，移民一般表示接受的只是一些具有社会和经济意义的改革。至于政治改革，他们仅仅同意在人们认为土著居民已经到达“充分”进步的那个不确定的时期才能实行。一些意味深长的论调提出来了。1947年法规，被某些人看作是对“丧失荣誉”的法

国的"背叛"。况且，就目前形势看，"在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压力下，去讨论任何一项改革计划都是不合时宜的。"在联合国大会开会审查阿尔及利亚1957年1月事件的前夕，一个极右分子向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表示，他"代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声称，法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切声明都是无效的。这种论调虽然只对说话的人有效，但从中可以看出某种思想状况的粗浅反映。因此，一种奇怪的错觉出现了：世界各地只有阿尔及利亚除外，都有可能走向进步。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的最有代表性的组织，或者更确切地说，阿尔及尔、瓦赫兰、君士坦丁的市政长官的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市长联盟，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又如何呢？一般地说，并不显得那么感情用事。为了减少暴动，市长联盟认为，除实行残酷镇压、新闻管制、戒严、对所有罪犯实行"最严厉和立即执行的"刑罚外别无它法。总之，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来维护法国的主权（1955年5月）。许多人希望自行建立一些自卫队，可以自行报复。但当人们打算为一支巡逻队招募志愿人员时，由于所发的津贴被认为是"十分微薄"，因而应

募的人寥寥无几。

市长联盟很明确地表示不愿实行合并和成立单一选民团，它对任何一项实质性的纲领很少象这样明确地提出过主张。比如说合并，它之所以被搁置起来，对有些人来说，是由于移民不同意；对另一些人来说，是由于土著居民不愿意。某一个大城市的市长想联合全体居民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但又不说明将采取什么方法。这个市长表明有必要“和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进行讨论”，但在他的思想上并不明确究竟指的是谁，他只满足于指望“每一个对话者的善意”。

1956年1月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叛乱蔓延到所有的边境地区；在东部，从拉卡尔直到特贝萨，在西部，席卷特累姆森、马尔尼亚、奈德罗马三角地带；在科洛林区和米利亚，叛乱甚至深入到了苏马姆流域；又从大卡比利亚推向米提贾平原。此外，由于解散了国民议会，由于法国在选举时期实际上已没有政府。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因阿尔及利亚的选举延期，以致他们在巴黎没有代表。他们感到已同法国本土断了联系，因此认为，已为祖国所抛弃，但这一步迅速地越过了。人们振奋

起来了，组成了要求戒严的一些委员会，并在阿尔及尔成立了一个"救国政府"，它只说不做，夸夸其谈。大学生们骚动起来了，成立了一个大学行动委员会，要求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权，但始终没有提出办法来。退伍军人参加了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混乱的气氛中，人们得悉居伊·摩勒的新政府任命卡特鲁将军为驻阿尔及尔的驻节部长。当时，愤怒的情绪到了顶点。群众热烈欢送雅克·苏斯戴尔总督；而过去也仍是这批居民，曾以不信任的态度来接待他，认为他是犹太人一伙的，因为他是由孟戴斯－弗朗斯任命的。今天，这批居民却反对他离任。在这些欢呼声中，实际上，也高呼着"打倒卡特鲁！"

尽管卡特鲁在2月4日向一家巴黎的日报发表的声明（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具有穆斯林的独立地位，也拒绝把它转变为民族主义国家）没有引起任何不安，但他还是被称之为"放弃海外领地的专家"，而这在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称号。正在这个时候，宣布了内阁总理要来阿尔及尔并将任命一位新总督的消息。退伍军人决定让这位总理进入"一座死城——这里的居民以沉默

来表示反对”，但是若干极端分子早已准备好要把这次“充满尊严”的示威变成一个骚乱的日子。

2月6日，内阁总理受到侮辱性的叫喊声的接待。各种东西一齐向他掷来，他来到了烈士纪念碑前，他所献的一束鲜花立即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被践踏坏了。夏宫总算没有遭到袭击。街上，共和保安队同有许多大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者发生了冲突。第三天，市长委员会的一项声明激起了新的骚动。镇定自若的内阁总理坚持要同居民中有资格的代表进行会谈。他在庄严的声明中指出，连结着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种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最后，卡特鲁将军的辞职使人心稍为安定。可是在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期间，人们看到，一位巴黎律师表示，在必要情况下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提供反恐怖分子突击队的协助，这些反恐怖分子突击队似乎是他在法国组织起来的。

接着，他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六个由极右派组成的反恐怖分子团体。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了1956年12月30日阿梅代·弗罗热的葬礼，阿梅代·弗罗热是被一个凶手杀害的市长

联盟的主席。这是一次既混乱又流血的葬礼：政府秘书长受辱；一颗炸弹在墓地爆炸；仪仗队路过地区的穆斯林遭到报复，他们的汽车、商店和人身都遭到攻击；反对示威的恐怖分子被击败。晚上，炸弹在阿尔及尔的几个教堂爆炸，造成了损失。

在这种气氛下，如果不谈到阴谋事件，这倒是奇怪的了。一位将官打算绑架总督，并在阿尔及尔夺取政权。这类奇特的阴谋事件的制造者，在酒吧间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而其支持者，无论在法国和在阿尔及尔，始终支持的为数甚少。不久之后，在闹市中出现了一件奇特的谋杀案，从一百米远的一所平顶房屋上，由反坦克火箭炮向第十区总指挥官的私人办公室发射了两枚火箭，一位军官被打死。这件谋杀案既不是民族解放阵线干的，也不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干的，而是一些反恐怖分子干的。

穆斯林议员的反应　在目前的形势下，要想了解一个普通穆斯林的真实思想，是枉费心机的事情。最可靠的倒是掌握那些被人们看作是土著代表的思想状况。

土著代表对一些事件的反应自然不同于阿尔

及利亚的法国人；从一开始，他们就谴责过所有异乎寻常的和集体惩罚的措施。就政治观点而言，如果说伊斯兰教贤哲会一直表现为教条式的、不可调和的反对派，那么，第二选民团的政治见解却经历了一番演变过程。1954年11月24日，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在阿尔及利亚议会上提出一项动议，仅仅要求政府"迅速促成那些既符合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望又符合于法国宪法的许诺的体制改革"，这些改革是"建立在法国民主政体范围内的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在上次战争以前，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曾要求在法国选民团中参加选举，但无结果；他们所表示支持的合并政策，从一开始就没有执行；"现在已经过时了"的1947年法规，也完全没有实施过。因此，向民族主义演变就被强调起来了。既然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没有受到法国政府的关心，那么他们是否可以寻求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的基础呢？难道这个新的解决办法会不符合"这种已经赢得绝大多数居民拥护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观念的活生生的现实"吗？

1955年9月26日，也就是阿尔及利亚议会

召开前夕，议会的议事日程已安排了对初步改革的审议。君士坦丁众议员本·贾卢勒博士直到那时仍是一个主张把阿尔及利亚完全并入法国的支持者，要求表决一项由第二选民团选出的六十名议员(众议员、参议员、阿尔及利亚议会代表)所提出的动议，这项动议认为："穆斯林居民既然具有民族观念，那么，他们的代表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继续努力使之实现。"表决这项动议，并不是没有冲突的，也不是没有压力的。它招致了第二选民团选出的最有代表性的议员、前阿尔及利亚议会议长阿卜德拉赫曼·法赖斯的抗议。他在一次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无线电广播演说中，宣称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把阿尔及利亚立即而又真正地合并到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法兰西共和国，这次讲话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六十一人团"的发言人把已被表决的那项动议说得毫无价值，看来这项动议的唯一目的在于"把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提出来，以引起政府对这一新事物，即阿尔及利亚民族观念的注意，并敦促政府作出一项决定。"

"六十一人团"经常发表一些声明来表示其存在。1956年1月5日，它声明"阿尔及利亚问题

不是一个食品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久之后，第二选民团选出的全体议员进行威胁：如果政府在议会成立后的一个月期间，还没有表明决心要采取一项符合阿尔及利亚人民愿望的政策，那么他们就将煽起罢工。4月14日，他们“重新考虑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以后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被选为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党的代表，“他们将会被当作真正的对话者”。

1955年8月，费尔哈特·阿巴斯的侄子被恐怖分子杀害——必须消灭那些有可能同法国进行对话的穆斯林。在他身上发现了还要杀害众议员本·巴赫迈德的命令。本·巴赫迈德却还是和本·贾卢勒一起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公告，——后者确信他自己也会因此被处死——让人们知道搞这类谋杀事件是为了“在阿尔及利亚挑起事端，造成一种紧张状态”。至于费尔哈特·阿巴斯，他毫不犹豫地把他侄儿之死归咎于“某一个殖民主义的警察集团”。

1956年4月24日，各报刊都报导了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的领袖和弗朗西斯博士，与伊

斯兰教贤哲会、民族解放阵线参谋部的图菲克·马达尼、谢赫·阿巴斯同时在开罗会合的消息。在一次用法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阿巴斯确认殖民制度是唯一的关键问题。在阿尔及利亚不再是只有一个党派，而是有着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全体人民。“我们准备以民族解放阵线的名义同法国谈判。谈判一开始，我们就要提出一个条件：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实体”。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份用英文写的但被否认的文件，威胁说“要把战争引向法国”。

1956年9月25日，也就是阿卜德拉赫曼·法赖斯主张合并政策的声明发表一年之后，他又向一家巴黎报纸发表了一些反响很大的声明。这已经不再是合并的问题，而是同“几乎全体阿尔及利亚人民都团结在它的周围”的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问题了。虽然法赖斯一字不提他的那些遭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教胞，但他强烈地谴责了通过镇压进行的“合法谋杀事件”。“法国凭什么理由拒绝把不久前给予多哥的东西也给予阿尔及利亚呢？由于法国的同意，多哥成了一个具有法国和多哥双重国籍，有它自己的国旗、国庆节和国歌的

自治共和国。”一个月之后，法赖斯大约是从策略上考虑来阐明他的新立场。“我之所以摆脱约束，是为了击败一种阴谋，这种阴谋的目的是想把一名握有军政大权的军队首领置于阿尔及利亚元首的地位上。我曾希望避免发生最坏的事情。”

人们把阿巴斯和法赖斯的团结归功于民族解放阵线，而把“六十一人团”的演变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阿巴斯或许曾害怕象他侄子那样地被谋杀，另一些人或许对种种秘密而明确的威胁有过深刻的印象，这类事情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即，前途变幻莫测，阿尔及利亚也许有一天脱离法国；为了“不致从肉体上和政治上被消灭”，并处于必须决定阿尔及利亚未来命运的地位，那么给明天的主人们以足够的保证是适当的。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

政府的立场 1954 年 11 月以来的历届内阁总理都一致强调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各种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1954 年 11 月 12 日)说：“对付叛乱活动，决不手软，决不妥协。阿尔及利亚各省是共和国的一部分。分离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是应该永远明确的，也应

该为所有的人所明确。”

埃加·富尔(1955年10月14日)说:“既然选用‘合并’这个词,我们就是摒弃了——这是为了确定这个词的意义——分离和同化。”合并将尊重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特点和人格,特别是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合并将一视同仁地赋予所有居民以法国公民资格所具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3月,埃加·富尔内阁曾要求表决一项“立即授予总督和省长以各种权力”的法律,这项法律适用于处理一切足以危害国家主权的事件。“如果议会解散,这项法律即自动停止生效。为了避免当局的无所作为,政府就得制定一项法令(1955年12月3日),根据这项法令,总督和省长应在二十天内汇报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其它原因,也可不予明确规定,——即在特殊情况下,总督和省长应采取措施,以确保公共秩序。”

居伊·摩勒从1956年2月10日发表的声明起,到1957年1月9日关于“阿尔及利亚根本法”的演说止,他一直坚持同样的原则。他向叛乱的领袖们提出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停火;——在局势恢复平静后三个月期间,由单一选民团进行自

由选举，产生有资格的对话者，政府将同他们讨论阿尔及利亚未来的法律地位。其目的是：与现存的社会集团平等共处；在恢复阿尔及利亚的自主地位的同时，维持法阿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所有居民之间公平分享财富，参加工作和承担责任。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被拒绝，这是导向独裁或建立某些阿拉伯国家封建制度的一种倒退。

由于1956年3月授予驻阿尔及利亚的驻节部长以全权，以及内阁的一些法令又允许他在维护秩序和促使社会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此一个广泛的改革方案才能够及时付诸实施。

改革 雅克·苏斯戴尔总督曾经为改革作过准备，他的后任者罗贝尔·拉科斯特又曾扩大和实行过改革。后来由于长期拖延，人们不得不同时公布这些改革内容，不再等待了。人们不得不在事态严重、危急的时刻着手解决，如果有先见之明的话，这种解决办法早可以在缓和、好转的时刻分阶段进行。

行政改革 阿尔及利亚之所以管理不善，是由于疆域辽阔，这就妨碍了各地方当局采取直接

而迅速的行动。省的数目已从三个增加到十二个，同时县的数目也从十三个增加到三十六个。混合市镇已由一千二百个全权市镇所代替，这些市镇设有由单一选民团选出的市镇议会。为了纠正现行议会在组织上(法国人占五分之三，穆斯林占五分之二)的不公平现象，已决定逐步撤消。在由单一选民团进行下届选举前，暂由法国人和穆斯林两个社会集团各占半数的一些特别代表团来代替。阿尔及利亚议会和省议会被撤消，省议会由行政委员会代替。这些行政委员会的代表和其它一些省的代表将组成阿尔及尔、瓦赫兰、君士坦丁的地区议会。

穆斯林开始担任公职　在下层社会，土著子女的入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1938 年，六百二十万居民中进小学的儿童，近十万四千名，其中女孩一万七千名。1955 年，进小学和幼儿园的，共计二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八名男孩和九万四千零七十六名女孩。尽管 1945 年以来作了巨大的努力，但由于出生率激增，入学问题远未解决。

在穆斯林青年中形成了一批优秀分子。他们并不缺乏理解力、想象力和说话能力。到目前为

止，这批人中成为工程师的却极少。虽然他们不大有意从事文学和科学的高深研究，但他们很喜欢学习医学，学医可以保证他们拥有顾主和维持生活；或者喜欢学习法律，学法律可以使他们进入律师界和政界。二十五年前，医学院院长曾鼓励过他的一名特别有天赋的学生准备大学助教考试。这样在阿尔及尔学院里就至少会有一名穆斯林。这个年轻人曾说，他为此深受感动，但是，他对于为一个毕竟渺茫的结果要花上几年时间去从事学习而犹豫不决。"我的医生执照保证我的物质生活，其实，我的志向是想从事政治。"人们还可以举出其它一些例子。

1954年，穆斯林在各种公职中的比例仅占29%。许多青年人太穷或家庭负担太重，不可能进正规学校和得到各种合格的文凭。根据这种情况，便创立了一个行政管理速成训练中心，以适应穆斯林青年的需要，训练中心授予一张可以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证书，学生还能得到助学金的帮助。1955年10月，举行了第一届学生入学典礼。应考者有好几百人，录取一百四十七名，其中一百三十三名是手工业者、职员、工人和农民的子弟。

曾经作出决定：穆斯林在行政机关中的比例将占50%。一些私营企业，即使没有得到国家津贴的私营企业，也被敦促实行这个平等的措施。

农业改革　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根据阿尔及利亚缺粮和不发达这一事实提出来的。以下是根据1955年和1938年的统计数字，对阿尔及利亚经济作一个概括的总结。由于机械化(联合收割机，1955年是三千七百台，1938年是五百台；拖拉机，1955年是二万多台，1938年是五千台；还有许多大型的开垦器材)和技术革新，产量达到或超过了1938年的水平，三百四十八万四千公顷土地，生产了二千三百六十七万二千公担粮食(阿拉伯农作物硬麦；欧洲农作物软麦；大麦，燕麦)，相当于战前几年的平均数。时鲜蔬菜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公担，超过1938年将近70%。水果增加了三倍，达到三百七十万公担。

葡萄园的垦殖面积比1940年缩减四十万公顷，但1954年的收获(一千九百万公石)相当于过去的平均数。无花果一百多万公担，过去的平均数是六十五万公担；油料作物十一万七千公石，过去的平均数是十一万二千公石；烟叶为十八万五

千公担，过去的平均数是十六万二千公担。新的农作物：大米，种植面积二千九百公顷，收获稻谷七万八千公担；扁豆出口十五万公担；三千九百公顷土地生产的甜菜，制糖五十吨。地下资源的开发正在进展中：开采了三百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三十七吨铁矿石和七十八万三千吨磷酸盐，过去的平均数分别为三百万吨和五十八万四千吨。

阿尔及利亚的设备情况是：公路五万五千公里，铁路四千四百二十公里，港口二十一个，阿尔及尔、瓦赫兰、波尼是其中最大的三个港口。出入船只：一万八千三百五十艘；吨位数：三千四百九十八万七千吨；经过的旅客数目：八十万零八千三百三十六人。有一个航空网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和法属非洲的一些重要中心联系起来。阿尔及利亚的对外贸易：出口二千四百四十亿法郎；进口一千六百十亿法郎。

不管生产有多大的进步，但它还远远不能同消费者人数的增长相适应。1954年，阿尔及利亚有居民九百五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名，其中欧洲人占一百二十八万九千名(包括五万九千名外国人)，土著居民占八百二十三万九千二百五十六

名[1]。目前，土著居民每年增加二十五万人，相反地，在同一个时期内，肥沃土地由于水土流失而被破坏的达三万六千公顷。自1942年起，土地整治局在十五年中仅整治了十五万三千公顷土地，而需要整治的土地达三百万公顷。有人曾写道："在阿尔及利亚，可耕地每天至少减少一百公顷，而需要供应口粮的人数每天增加七百人。"

为了实现七十万失业工人的充分就业，只有实行工业化这一个办法。从1945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一个设备计划使一些由政府批准的工厂获得了税收、财政方面的优惠(1946年以来，已批准了一百六十四家工厂)。这些工厂朝着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方向发展(食品、纺织品、钢铁业、建筑材料、橡胶、阿尔法草)。现在人们正在考虑建立一整套工业体系；第一个计划已确定围绕科隆-贝沙尔煤炭工业来进行。

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工业的跃进受到了动力不足的限制。(1955年，所有火力和水力发电站只生产了阿尔及利亚所需要的电力的三分之一。)所有的企业都是简陋的，不能同欧洲的大工业相

[1] 原文如此，数字疑误。——译者

提并论。虽然劳动力并不缺乏，而且设立了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机构，经常有二万三千名学生、学徒和工人参加学习，但熟练工人仍旧不足。现在，工业生产占阿尔及利亚收入的三分之一。

为了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提高农业工人的工资和修改租佃制。对于那些至今只得到收获的五分之一的佃农，实行了法国的平分交租制，即实行对半分配。此外，老年工人退休制已在阿尔及利亚范围内实行，二十万穆斯林受到好处。最后，农业社会保险已得到了发展。

土地改革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它使农民成为他们所劳动的那片土地的所有者，向他们传授现代的耕作方法，并用补助金或长期贷款帮助他们。首要的一点是安排足够的耕地面积。修建大的拦河坝能够开辟一个面积为十五万多公顷的"灌溉区"。因此提高了价值的这些土地，由土地所有者耕种其中的一半。国家为取得一个起码的成果就得支出几十亿法郎。1942 年的马丹法是为了组织力量来整理这些土地，但它没有被执行。

1955 年 3 月 25 日的法令，规定征用那些未曾开发而得不到灌溉的零星土地。4 月 28 日，

公布了阿尔及利亚土地法。由于所征用的最初几批土地分属于近四百个土地所有者，农民们开始被重新安置。7月13日创立的农村不动产联合银行，有权通过征用大地产或洽购的方式获得必要的土地，进行整治和投资。这项主要的改革由于实用的农业教育、信贷和互助的发展而完善。农业改进区的数目增加了。它们借助于指导员和开垦突击队进行一种教育活动。1955年初，农业改进区中专门从事谷物种植的指导员和开垦突击队管理着二百五十八万二千公顷的土地和二十多万农民。每公顷的产量提高了一倍(从四公担提到八公担)。果园和林场(三百万棵树)面积扩大到三万六千公顷。农业改进区从1947年到1955年增产了六十亿法郎的财富。

农业救济会的目的是，向小农提供实物帮助(农业物资、种子或现金)，以便利他们的工作。农业救济会分成好几个部门(信贷、谷物种植、树木栽培、物资)，由六十多万穆斯林会员选出代表进行管理。1953年，发放的贷款达二十三亿一千四百万法郎。因此，土著农民的大规模经济革新计划得以逐步实现。

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专著。人们曾拒绝同化；曾谈论过合并，但马上又认为这超过了限度；人们也曾谈论过在法兰西共和国范围内实行一种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的地方分权。人们曾经寻求解决办法，但并不是寻求一个穆斯林和法国人将会协调地生活在一起的法国-穆斯林的坚强集团，而是把他们划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法国人的，另一个是穆斯林的，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法规。人们曾主张首先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特点，经过一段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再成立一个阿尔及利亚民族国家。人们曾建议把阿尔及利亚划分为两个自治国家：一个在东部(卡比利亚和君士坦丁)，另一个在西部(特累姆森及特累姆森地区)，阿尔及尔和瓦赫兰地区则并入法国本土。一种联邦制似乎是受欢迎的，这种联邦制涉及到宪法的改革，将使法国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这是未来的事情。

目前，政府已经致力于从根本上重建阿尔及利亚。在地方议会和省议会中，法国人和土著居民平等合作，有可能在他们之间产生信任；另一方面，农业改革会形成一个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它

将是阿尔及利亚的坚强的基础。这些改革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产生效果，但它们是现实的。

当前，阿尔及利亚的当务之急是，在达到出自内心的和解之前，先要恢复实质上的和平。从原则出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地位将不是单方面作出决定的结果，而是同居民代表商讨的结果，内阁总理曾多次向民族解放阵线建议，实行没有任何先决政治条件的“停火”。恢复平静之后，将举行自由选举，选出选民的真正代言人。这个计划具有符合逻辑的价值，但它的实行应当考虑到今后的事实。

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观念是同历史真实相矛盾的，对于人民来说，信奉同一个宗教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民族，这是无可争辩的事。但是在那种凭借已成为自由国家的原殖民地区的榜样进行顽强宣传的情况下，必然会得出独立的结论的民族观念，即使它的根子不深，也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思想，这种思想必然会使人盲目相信它是根治贫困的灵丹妙药，会给他们带来一个黄金时代。

一些事件的发生，曾使阿尔及利亚的群众出现一种无限制的盲从，很容易地接受民族解放阵

线的宣传。群众对法国人将查封土著居民存在储蓄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以及在学校里给儿童种痘不过是毒害儿童的一种借口的说法竟信以为真。

他们竟然相信纳赛尔的潜艇已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水域，他的飞机已翱翔在阿尔及利亚的上空。比克巴希仍然是"伟大的胜利者"，父母们都坚持把他们新生的子女取名为比克巴希。一件倒霉的事突然临到了本·贝拉和他的开罗战友们身上，他们乘坐的从拉巴特飞往突尼斯的飞机迷失航向，并在阿尔及利亚被捕，这件事引起一时的惊慌，但他们仍然被看作为"民族英雄"。

从一开始，群众就相信展示出美好前景的口号："法国人离开阿尔及利亚；他们的财产是属于你们的。"从那时候起，"法特马斯"(土著女佣人)反复唠叨着："现在，我的女主人将是我的仆人。"如果有人问她们将用谁的钱付给仆人，她们回答说："用她将要给我的钱。"有些人曾要求她们的女主人给一张确认她们在某地工作良好的证明书。"好吧，夫人，你吗，你必须离开，我呢，我要占有这个公寓。"这是些小事情，但可以很好地了解有着未来选民的这部分群众的思想状况。

人们谈论“自由”选举。的确，我们将能保证投票自由，投票箱将不会弄虚作假。但是，即使有联合国派遣的观察员在场，人们能够阻止敌人对那部分已经具有阿尔及利亚解放思想的群众进行有成效的宣传吗？选举结果恰好是民族解放阵线占压倒多数的选举。他们将是政府所希望的真正的对话者吗？

实际上，这些选举要在“停火”实现后三个月才能举行。内阁总理在这方面反复提出的建议仍然得不到答复。人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所犯的错误与一个多世纪前阿卜德·卡德尔所犯的错误一样。埃米尔一直认为，法国人多次表示的和平诚意是一种虚弱的表现，从而鼓励他继续进行战争。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们也是如此，所有建议、所有讲话和一举一动都使他们确信法国人只是在寻求谈判，被他们看作是我们疲惫不堪的证明。结果是鼓舞他们决不妥协——“在法国人承认阿尔及利亚国家之前‘决不停火’”——他们一开始就是采取这种态度的。除非他们自己承认是战败者。

最后的一件事是另一类情况。1956—57 年

度的阿尔及利亚预算高达二千零七十亿法郎，这笔预算是由提高正常税收四十亿法郎和由法国每年增加一百五十亿一直到1962年最高达一千六百亿法郎的分担额来支付的。“阿尔及利亚甚至不能再弥补它的平时预算(经常预算)，而在临时预算(其中有用于当地未来的开发投资)中法国要承担80%”(亚科诺)。难道人们会相信：在财政和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条件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是可能的吗？

1957年5月。

简 要 书 目

一般著作：

Julien (Ch.-A.),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avec bibliographie critique, 2e éd., t. III: Depuis 1830 (à paraître).

Bernard (Augustin), L'Algérie (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t. II). Paris, 1930.

Esquer (Gabriel), Iconographie historique de l'Algérie (XVIe siècle-1871). Paris, 1929, 3 in-fol.

军事和政治史：

Pellissier de Reynaud (Edm.), Annales algériennes, 2e éd. Paris, 1854, 3 vol.

Azan (Gal Paul), Conquête et pacification de l'Algérie. Paris, 1932.

——L'armée d'Afrique de 1830 à 1852, Paris, 1936.

——L'émir Abd-el-Kader, Paris, 1925.

Saint-Arnaud (Mal Leroy de), Lettres (1832-1854). Paris, 1858, 2 vol.

Esquer (G.), Les commencements d'un empire, la prise d'Alger (1830), 2e éd., Paris, 1929.

Bernard (Aug.) et Lacroix (N.), La pénétration saharienne, Paris, 1906.

Desparmet (J.) Les mouvements nationalistes en Algérie (articles parus de 1932 à 1938 dans le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frique française).

Esquer (G.), 8 novembre 1942, jour premier de la Libération. Alger, 1946.

Julien (Ch.-A.), L'Afrique du Nord en marche. Paris, 1952.

Soustelle (Jacques), Aimée et souffrante Algérie. Paris, 1956.

政府、殖民化、经济:

Par l'épée et par la charrue. Ecrits et discours de Bugeaud, publ. par général Azan.

Germain (Roger). La politique indigène de Bugeaud. Paris, 1955.

Yacono (Xavier). Les bureaux arabes et l'évolution des genres de vie indigènes dans l'ouest du Tell algérois. Paris, 1953.

L'oeuvre législative de la France en Algérie (Régime législatif, par L. Milliot; Institutions judiciaires, par M. Morand; Régime foncier, par F. Godin; Régime douanier par M. Gaffiot). Paris, 1939.

Cambon (J.), Le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Algérie (1891–1897). Paris, 1918.

Annales de la colonisation algérienne, publ. sous la direction de H. Peut. Paris, 1842–1858, 14 vol.

Baudicour (L. de), La colonisation de l'Algérie. Ses éléments. Paris, 1856.

——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de l'Algérie. Paris, 1860.

Gautier (E. F.), L'Algérie et la métropole. Paris, 1920.

Isnard (H.),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propriété rurale dans la Mitidja (1846-1867). Ses conséquences sur la vie indigène. Alger, 1949.

——La vigne en Algérie. Etude géographique, 2 vol. parus. Gap, 1951-1954.

Passeron (M.), Les grandes sociétés de colonisation dans l'Afrique du Nord. Alger, 1925.

Peyerimhoff (de), Enquête sur les résultats de la colonisation officielle de 1871 à 1893. Alger, 1906, 2 vol.

Yacono (X.), La colonisation des plaines du Chélif, 2 vol. Alger, 1955-1956.

——Initiation économique, dans Initiation à l'Algérie. Paris, 1957.

Exposé de la situation de l'Algérie présenté par le Gouverneur général. Annuel depuis 1861.

Documents algériens publiés par le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puis 1947.

人名译名对照表

三　画

马约，亨利	Maillot, Henri
马迪丁	Mahieddin
马格里特	Margueritte
马斯特	Mast

四　画

比克巴希	Bikbachi
比松	Pichon
比斯纳赫	Busnach
瓦尼埃	Warnier
瓦尔森-埃斯泰拉齐	Walsin-Esterhasy
瓦罗尔	Voirol
瓦莱	Valée
贝当	Pétain
贝图阿尔	Béthouart
贝特泽讷	Berthezène
毛克拉尼	Mokrani

巴克里	Bacri

五 画

艾因·马赫迪	Aïn Mahdi
艾森豪威尔	Eisenhower
本·巴迪斯	Ben Badis
本·巴赫迈德	Benbahmed
本·苏莱曼	Ben Selman
本·贾卢勒	Bendjelloul
布·马扎	Bou Maza
布瓦松	Boisson
布尔蒙	Bourmont
布迪亚夫	Boudiaf
布洛利	Broglie
布朗当	Blandan
布勒松	Bresson
卡米，阿尔贝	Camus, Albert
卡齐米尔-佩里埃	Casimir-Périer
卡芬雅克	Cavaignac
卡特鲁	Catroux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Gamal Abd-el-Nasser
圣阿尔诺	Saint-Arnaud
圣·阿杜安	Saint Hardouin
弗罗热，阿梅代	Froger, Amédée

弗拉泰尔斯	Flatters
弗朗西斯	Francis
皮亚福尔	Pillafort
皮雷特	Pirette

六 画

吉罗	Giraud
西·苏莱曼	Si Sliman
西·哈姆扎	Si Hamza
达尔朗	Darlan
达尔郎热	d'Arlanges
达来朗	Talleyrand
达斯蒂埃，亨利	d'Astier, Henri
毕若	Bugeaud
当雷蒙	Damrémont
朱安	Juin
优素福	Yusuf
多马	Daumas
安凡丹	Enfantin

七 画

麦克马洪	Mac-Mahon
克洛塞尔	Clauzel

克莱米约	Crémieux
苏尔特	Soult
苏斯戴尔，雅克	Soustelle, Jacques
里戈	Rigault
里夏尔	Richard
里奥戴	Lyautey
邱吉尔	Churchill
阿卜德·卡德尔	Abd-el-Kader
阿卜德·卡德尔·吉拉尼	Abd-el-Kader el Djilani
阿卜德·克里姆	Abd-el-Krim
阿卜德拉赫曼·法赖斯	Abderrahman Farès
阿卜德·哈米德·本·巴迪斯	Abdel-hamid Ben Badis
阿卜德·穆明	Abd el Moumen
阿拉勒·法西	Allal el Fassi
利什特兰	Lichtlin
杜兰	Duran

八画

若纳尔	Jonnart
奈穆尔	Nemours
拉帕塞	Lapasset
拉佩里纳	Laperrine
拉科斯特，罗贝尔	Lacoste, Robert
拉勒芒	Lallemand

拉摩里西尔	Lamoricière
尚济	Chanzy
罗维戈	Rovigo
罗斯福	Roosevelt
迪布泽	Du Bouzet
迪佩雷	Duperré
佩里西埃	Pélissier
法赫拉特·本·赛义德	Fahrat ben Saïd
波林尼雅克	Polignac
居约	Guyot
孟戴斯-弗朗斯，皮埃尔	Mendès-France, Pierre

九　画

茹安维尔亲王	prince de Joinville
威尔逊	Wilson
哈马舍尔德	Hammarskjoeld
哈达德	El-Haddad
哈莱德	Khaled
侯赛因	Hussein
费尔哈特·阿巴斯	Ferhat Abbas
费里，茹尔	Ferry, Jules
胡基奈·拉胡勒	Hocine Lahouel

十 画

埃凯，范	Hekke, Van
埃特·艾哈迈德	Aït Ahmed
埃斯特瓦	Estéva
格雷维，阿尔贝	Grévy, Albert
索兰	Saurin
莱奥纳尔	Léonard
莫雷斯	Morès
夏泰尔	Châtel
夏泰尼奥，伊夫	Chataigneau, Yves
热拉尔	Gérard
热朗特	Gérente
图菲克·马达尼	Tewfik el Madani
特雷泽尔	Trézel
拿破仑第三	Napoléon III
诺盖	Noguès
朗贝尔	Lambert
朗东	Randon

十一画

梅萨利·哈吉	Messali Hadj
梯也尔	Thiers

基佐	Guizot
勒梅格尔-迪布勒伊	Lemaigre-Dubreuil
萨拉赫·本·优素福	Salah ben Youssef
康崩	Cambon
盖东，德	Gueydon, de
维耶尔莫兹	Vuillermoz

十二画

博弗尔	Baufre
博雷尔，佩特律斯	Borel, Petrus
奥马尔公爵	duc d'Aumale
富尔，埃加	Faure, Edgar
谢赫·阿巴斯	Cheikh Abbas

十三画

蒙塔尼亚克	Montagnac
雷吉思，马克西米利阿诺	Régis, Maximiliano

十五画

德比西，让蒂	de Bussy, Genty
德瓦尔，皮埃尔	Deval, Pierre
德米歇尔	Desmichels

德里安	Derrien
德拉莫雷尔	de La Maurelle
德拉夏佩尔，博尼埃	de La Chapelle, Bonnier
德富科尔	de Foucauld
德鲁埃·德尔隆	Drouet d'Erlon
德雷诺，佩利西埃	de Reynaud, Péllissier
德雷菲斯	Dreyfus
墨菲，罗伯特	Murphy, Robert
摩莱	Molé
摩勒，居伊	Mollet, Guy

十六画

穆罕默德·本·贝拉	Mohammed Ben Bella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	Mohammed ben Abdallah
穆罕默德·赫德尔	Mohammed Khider
穆斯塔发·本·伊斯梅尔	Mustapha ben Ismaïl
穆斯塔发·本·萨米	Mustapha ben Thami
儒斯	Jousse

十七画

魏刚	Weygand
戴高乐	de Gaulle

地名译名对照表

二　画

卜利达	Blida

三　画

土伦	Toulon
马扎格兰	Mazagran
马尔尼亚	Marnia
马克塔	Macta
马斯卡腊	Mascara

四　画

比邦山脉	Bibans
比斯克腊	Biskra
开罗	Caire
瓦格拉	Ouargla
瓦赫兰	Oran
瓦赫兰尼亚	Oranie

韦德泽纳蒂	Oued Zenati
贝尼萨夫	Beni-Saf
丹吉尔	Tanger
巴格达	Bagdad
巴特纳	Batna
巴博尔	Babors

五 画

艾因阿比德	Aïn Abid
艾因萨拉赫	In Salah
古努德	Gounod
布日伊	Bougie
布法里克	Boufarik
布鲁塞尔	Bruxelles
卡比利亚	Kabylie
圣夏尔	Saint-Charles
尼奥尔	Niort

六 画

西迪易卜拉欣	Sidi-Brahim
西迪费鲁希	Sidi-Ferruch
达赫拉山	Dahra
达喀尔	Dakar

伊斯利河	Oued Isly
安法	Anfa
安特卫普	Anvers
米利亚	El-Milia
米利亚纳	Miliana
米提贾	Mitidja

七　画

麦迪亚	Médéa
克德达拉河(布杜阿乌)	Oued Keddara (Boudouaou)
苏马姆河	Soumamm
苏弗绿洲	les oasis du Souf
苏克阿赫腊斯	Souk-Ahras
里奥萨拉多	Rio Salado
亨谢拉	Khenchela
库巴	Kouba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阿尔泽	Arzeu
阿杰尔	Adzjer
阿勒格河	Oued el Alleug
阿鲁什	El Arrouch

八 画

直布罗陀	Gibraltar
杰米拉	Djémila
奈德罗马	Nédroma
拉巴特	Rabat
拉卡尔	La Calle
拉格瓦特	Laghouat
帕勒斯特罗	Palestro
帕尔马	Palma
图瓦特	Touat
图尔	Tours
图古尔特	Touggourt
波尼	Bône
姆扎卜	Mzab
季杰利	Djidjelli

九 画

科洛	Collo
科隆-贝沙尔	Colomb-Béchar
哈利阿	El Halia
哈姆扎	Hamza

十 画

埃杜格	Edough
格勒马	Guelma
莫斯塔加内姆	Mostaganem
特贝萨	Tébessa
特尼阿峡谷	le col de Ténia
特勒	Tell
特累姆森	Tlemcen
宾泽特	Bizerte
热里维尔	Géryville

十 一 画

勒阿弗尔	Le Havre
菲吉格	Figuig
菲利普维尔	Philippeville
萨乌腊	Saoura
萨赫勒	Sahel
梅宗卡雷	Maison Carrée

十 二 画

塔弗纳河	Tafna

塔曼腊塞特	Tamanrasset
斯塔乌埃利	Staouéli
提迪克勒特	Tidikelt
提特里	Titteri
奥马尔	Aumale
奥雷斯山	Aurès
谢尔谢勒	Cherchell
谢利夫	Chélif

十三画

锡卡赫	Sikkakh
塞蒂夫	Sétif

十五画

德利-易卜拉欣	Déli-Brahim
摩加多尔	Mogador

十六画

霍加尔	Hoggar
霍德纳	Hodna
穆扎亚峰	le pic de Mouzaïa